

1924-1926 年《臺灣民報》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報導、評論以及論述轉折*

許時嘉**

摘要

1924-1926 年間，《臺灣民報》裡曾頻繁出現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相關評論與報導。本文聚焦這波論述的變化，觀察民報論者對日華親善論與亞細亞聯盟的態度，如何從確信走向懷疑。

1924 年受到美國排日法案衝擊，日本國內興起蘊含日華親善意涵的亞細亞聯盟論，引起朝鮮民間輿論反彈，強烈反對以日本為首的亞細亞聯盟。反觀《臺灣民報》，則是積極轉譯日本這波亞細亞聯盟的相關輿論，不但對日文原文進行去脈絡化處理，報導孫文大亞洲主義演講也出現刻板閱讀、漏譯與超譯的現象。由此可見臺人推動該波輿論成形的強烈慾望，也反映當時民報論者曾確信：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是有效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論點之一。

然而，這股確信隨 1926 年後臺灣內外政治局勢變化而鬆動。第七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失利，加之中國對岸政局動盪牽引，文協對政治結社出現種種議論，左右兩派對立浮現，過去共同推動議會運動的「統一戰線」瓦解。此時，強調民族運動的右派人士，仍持續主張日華親善與建立亞細亞聯盟的必要性，但左派已轉向階級鬥爭。當統一戰線逐漸解體，左派人士重新調整無產階級鬥爭的論述路線，揚棄穩健派民族自治、成立議會的種種論點，過去曾一度共同支持的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論述，自然也不再被提及。

關鍵詞：日華親善、亞細亞聯盟、美國排日移民法、《臺灣民報》翻譯問題、孫文大亞洲主義

* 本文為筆者 JSPS 科研費 JP20K00092「基盤研究(C)：1920-1930 年代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アジア共同体認識の変容」研究成果之一。撰稿期間感謝多位學界先進指點賜教，並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日本山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來稿日期：2023 年 3 月 3 日；通過刊登：2023 年 7 月 17 日。

- 一、前言
 - 二、從民報翻譯看臺人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想望
 - 三、臺人對孫文大亞洲主義的解讀
 - 四、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批評聲浪的出現：民報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的報導與轉折
 - 五、結論
-

一、前言

1920年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期，臺人追求政治權力時所援引的理論依據，往往與「日華親善」的口號同時出現。例如蔣渭水曾道：「臺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題，亞細亞民族聯盟，是世界平和的前提，世界平和是人類的最大幸福……簡直說來，臺灣人是握著世界平和的第一關門的鍵啦。」¹從日華親善的角度來定義臺灣人重要性，在當時臺人言論中隨處可見，更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主要論點之一。

回溯日華親善論在臺灣出現的過程，可發現兩種論點交相出現。一種是從貿易取向的實用角度，強調日清貿易往來的重要性與臺人居中可發揮的關鍵作用，如荒尾精。這種觀點構成臺灣總督府日後強調臺灣角色、加強對岸商業投資時的論述基調。另一種則是黃白人種對抗論，認為黃白人種終歸一戰，故須加強臺灣島內日人與臺人的關係，增進日華間感情連結。該論點起初由板垣退助引進 1914年臺灣同化會，成為臺人訴求平等的理論依據，爾後再由臺灣民族運動家們繼承，內化為日後臺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論述基調。1922年1月第二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宣傳手冊上提到臺人角色定位「在地理上，可以助成帝國的南方進

¹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1925年8月26日），頁45。

展，在歷史上，可以完成促進日華兩民族親善的重大使命」，首次明確將「日華親善」引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理念，此後一直持續。²

戰前臺人積極擁抱「日華親善」的論述，近年被認為是贏得日本政府信賴、進而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下簡稱「議會運動」）或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³表面上標榜日華合作的重要性，實際上卻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日方「日華親善」在思想與行動上的自相矛盾，建構臺灣民族運動的合法性，並對抗日本國內「大亞細亞主義」——併吞中國、掌握亞洲霸權——的思維。論者還強調，同時期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是臺人得以主張日華親善的思想泉源，藉此劃清臺人與日本右翼的思想界線。⁴

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林書揚等編輯、王乃信等翻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 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年）：第二冊 政治運動》（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頁12、43。〔按：以下省略編著者，簡稱《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當時〈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歌〉（謝星樓填詞）亦寫道：「日華親善念在茲，民情壅塞內外不知，孤懸千里遠西陲，百般施設民意為基，議會設置宜政無私，嘻、嘻、嘻，東方君子，嘻、嘻、嘻，熱血男子。」〈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歌〉，《臺灣》4:3（1923年3月10日），無頁碼。

³ 趙勳達認為1920年代臺灣民族運動論述深受1924年11月孫文在神戶演講所提的「大亞洲主義」——解放亞洲弱小民族的大同理想——影響，孫文思想激發了臺人追求民族平等地位的渴望，讓臺人在運動中「藉著日華親善的大旗為幌子」，得以光明正大地推行白話文運動及政治主張。趙文一再強調臺人對孫文思想的唱和，呈現一種臺人既熟稔又世故地利用日華親善論、且從未當真的事後論立場。延續這種工具論的脈絡，何義麟則分析1930年代臺灣日華親善論的軌跡，認為1937年中戰事爆發後臺人組織的亞細亞協會與其主張的「日華親善」，是「以去殖民化為最終目標，並為了獲得平等權利而提出的防衛理論」，迥異於日本亞細亞主義者以反歐美為名向外膨脹、侵略中國的理論。參見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國家發展研究》（臺北）10:2（2011年6月），頁77-116；何義麟，〈大亞細亞協會的活動と植民地知識人の対応：台湾における日華親善論の変容〉，收於松浦正孝編著，《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頁447-475。此外，關於日華親善口號下臺人所扮演的角色，還可見於江燦騰對日治時期臺僧參與東亞佛教活動的研究。江燦騰認為當時日本政府構建的日華親善口號，對於中日臺三地佛教積極交流起到主導作用，當中可見日本政府積極拉攏佛教界，以及中國大陸佛教代表主動參與交流的身影，但臺僧在此架構下，「是處於被動的、被指導的」，江文提供了本文主要討論對象（臺灣民報相關人員）之外其他臺人團體的活動面向。參見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1），頁323。

⁴ 關於臺人與孫文之間存在思想連結的討論，最早可見於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廣州）46:6（2006年11月），頁1-13。桑將1924年6月排日法案公布後所引起的日本國內輿論變動，視為孫中山11月赴日演講時選擇大亞洲主義作為訴求的主因；認為臺人正確把握住孫文論點，並從積極角度回應。然而，桑文對當時日本相關輿論動向的考察，僅僅是通過《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的中譯記事與報導來取得，並將其放大為全日本的論調，忽略《臺灣民報》對日本觀點的轉述，其實經過意識篩選與拼貼，恐難確切把握當時日本、臺灣、中國、朝鮮半島等東亞言論圈，彼此交流又拮抗的複雜構造。且誠如本文之後分析，1924-1925年當下臺人對孫文演講內容，其實存在刻板理解的盲點，未必如桑文所言，雙方意念完全相通。

然而，重新爬梳當時臺人政治運動的言論，在在可以感受到他們是真切想望日華親善。誠如周婉窈嘗言：日華提攜雖明顯與日本當局政治策略有關，但對當時臺灣知識分子而言，「恐怕是非常真切而實際可行的信念……我們很難逕指這種作為純粹只是政治要求的手段。……當代的臺灣知識分子對這些觀念多少懷著真誠的信持。」⁵若說 1930 年代九一八事變後，日中敵對關係成形、「日華親善」一詞淪為缺乏實體的口號，臺人自此認清真相、將日華親善視為一種對抗日本言說的手段，這不難理解。但若將時序倒回更早以前、日中關係尚未正式因戰爭而決裂的 1920 年代，中國國內各地已因山東二十一條問題而排日運動四起，此時臺人仍毫無芥蒂地擁抱日華親善論，這種「確信」——把日華親善作為政治運動理論依據的「確信」，究竟如何產生？之後又如何變化？將是本文關心的重點。

透過以上問題意識，本文將以《臺灣民報》（以下簡稱民報）作為觀察場域，討論民報如何透過翻譯，來重新詮釋美國排日移民法後瀰漫於日本國內的日華親善論與亞細亞聯盟論。⁶本文認為，臺人面對日本國內左右兩派對立的論點，不是單純被動地接收，而是恣意且能動地擷取自身想闡述的主題，甚至會適度編輯，反轉為自身需求所用，進行一種「去脈絡化」的翻譯。⁷本文並比較同

⁵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 16-17。

⁶ 關於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過程與影響、內部參與者的政治思想立場與行動主張的分合狀況，已有許多代表性的重要研究，如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2001）；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43-110 等。臺人政治運動家與同時期日本大正民主運動家在思想與行動理念上的嫁接與誤讀，可參見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另外，陳翠蓮曾指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人脈上與資源上較接近關心殖民地問題的右派自由主義者，係因日本社會主義者以為俄國革命成功與日本群眾運動興起代表階級革命即將實現，不關心殖民地問題，讓部分臺人自然傾向右派。參見陳翠蓮，〈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6（2013 年 12 月），頁 53-99。從結果看來，臺人的確從日本右派自由主義者及亞洲主義者的思想中練就一套論述模式：日本同意臺灣議會設置，才能實現日華親善與亞洲團結，保持東亞和平。然而，筆者在此想進一步討論臺人轉譯過程中「編輯」原文的行為，證明民報論者們對日本言論界引用，有更主觀的恣意性與選擇性。

⁷ 羅詩雲指出，日治時期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論者們在《臺灣青年》與《臺灣》的轉譯與轉載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羅詩雲，〈臺灣近代知識建構的可能：論 1920 年代《臺灣青年》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臺灣學研究》（新北）16（2013 年 12 月），頁 151-179。但羅對「能動性」的解釋，相對中性且溫和，認為它體現在臺人對世界新興思潮與進步言論的積極吸收，故他們會透過翻譯來

時期日本、朝鮮輿論界對亞細亞聯盟的態度，透過幾個代表性的事件：1924年孫文訪日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1926年亞細亞民族大會，來觀察臺人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認識與變化。

本文主要運用史料為1920年代日本、朝鮮、臺灣的主流報紙與期刊，並參考日本外務省與臺灣總督府的官方紀錄，以及文協人士日記。⁸透過日、朝、臺三地共時性的比較，可發現臺人推動議會運動時，一開始對日華親善論述確實抱懷期待，這讓他們積極鼓吹成立亞細亞聯盟，認為這是實現日華親善的試金石。但隨著議會運動不斷受挫，文協內部對政治路線意見分歧、左右分裂，造成部分臺人開始揚棄該論述。

二、從民報翻譯看臺人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想望

（一）民報對《改造》原文的去脈絡化

美國排日移民法於1924年5月公布，7月1日正式生效。排日法案風聲出現時，日本政府雖透過駐美大使埴原正直提出抗議，但並未以政府的立場積極抵制美國，這與當時「幣原外交」講究的協調路線相關。時任外相的幣原喜重郎，於任內（1924-1927年，1929-1931年）遵循一戰後凡爾賽體系的國際秩序，講究「協調外交」，包括：對中國採取不干涉主義，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堅持不介入；與蘇聯簽屬「日蘇基本條約」，確保日本在庫頁島石油、煤炭等天然資源之開採供應權。但該條約也造成日本通過「治安維持法」，加強取締社會主義思想相關言論。另外，幣原的協調外交也被軍部認為過度軟弱，軍部已在前兩年因華盛頓海軍軍縮會議吃悶虧，排日法案更引發軍部陷入次等國的危機意識，間接埋下日

達到啟蒙思想的目標。本文則認為，民報系列臺人論者的能動性，是體現在政治輿論的重塑與操作，甚至有去脈絡化的傾向，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圖。

⁸ 本文引用之日文文獻，無正式中文譯本者皆由筆者自譯。另外，民報報導多不具名，故本文分析各報導之論述屬性時，有署名者會貼近該人物政治立場進行爬梳，但其他無署名者，囿於史料本身的侷限性，礙難得知行文背後是否包含個人意識形態，僅能將之視為民報報社的某種論述基調，統一進行分析。

後軍部擴張的隱患。⁹

然而，民間對排日法案反應較政府激烈許多，右派勢力大聲討伐美國，左派勢力則是對日本國內與殖民地人權問題提出反省與警告。¹⁰ 這波浪潮下，日本國內部分輿論與政治界，開始明確浮現聯合東亞諸國勢力、建立亞細亞聯盟的主張，¹¹ 並獲得日本部分政黨人士公然表態支持，陸續形成行動團體。最具代表性的是1924年5月在野黨政友本黨相關人士成立的「東亞聯盟協會」，¹² 以及同年7月執政黨護憲三派內閣人士成立的「全亞細亞協會」。¹³ 這些團體多採積極與中國勢力合作、結盟的路線，體現了蘊含日華親善概念的亞細亞聯盟主張。

但同時，這些政治勢力的興起也引發朝鮮方面的戒心與恐懼，朝鮮輿論對美國排日移民法通過一事反應冷淡，並一面倒地批評日本國內推動亞細亞聯盟之不懷好意。例如，「東亞聯盟協會」發會式落幕後，《東亞日報》於1924年6月8日頭版社論再度公開批評東亞聯盟協會，指該會決議文雖高唱日本首要與亞洲各民族結盟，企圖與以山東二十一條威脅中國的加藤內閣作對，但一戰時日本曾向

⁹ 加藤陽子，《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東大式レッスン！征韓論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東京：講談社，2002），頁192、236-237。

¹⁰ 美國排日運動的歷史、成因與影響，詳見若槻泰雄，《排日の歴史：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日本人移民》（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簗原俊洋，《アメリカの排日運動と日米関係：「排日移民法」はなぜ成立したか》（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6）等。日本國內報章雜誌對排日法案的相關報導與反應，詳見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井清研究会編，《排日移民法と日本のマスメディア》（東京：該會，1996）與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井清研究会編，《排日移民法と日本のマスメディア・続》（東京：該會，2012）。

¹¹ 最典型的是日本右派雜誌《日本及日本人》。該誌連續數期劍拔弩張，大聲疾呼團結亞細亞。例如1924年5月1日號刊登〈米国の暴戾に対する全亞細亞民族的興奮〉，義憤填膺地要美國反省自身惡行，並自承要敲響警鐘、喚醒沉睡中的全亞洲民族。緊接著下一期5月15日號〈東西南北 眠れる大亞細亞の覚醒と白色侵掠の拒否〉鼓吹成立大亞細亞聯盟，主張「有色亞細亞」，要求白色人種退出亞洲。6月1日號則刊登一連串討論亞細亞聯盟的文章；同年10月秋季增刊號又刊載「大亞細亞主義」特集，刊載50篇論說，其中支持大亞洲主義與亞細亞聯盟的論點占壓倒性多數。

¹² 〈東亞聯盟會 本黨有志の計画〉，《東京朝日新聞》，1924年5月28日，第2版；〈加藤內閣反対 東亞聯盟發會式の決議〉，《東京朝日新聞》，1924年5月30日，第2版。據該報導，出席者有「渡邊陸軍少將、湯池幸平〔按：應為湯地幸平之誤〕、郝兆先、徐學挺、松田源治、木下謙次郎、中村啓次郎、田中捨身氏等，並有黑龍會、大化會、經國同志會代表者等兩百餘名」。

¹³ 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皆稱為「大亞細亞協會」，但根據日本外務省公文收錄之該協會刊行手冊顯示，其名稱為「全亞細亞協會」。參照〈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 第一卷 分割1〉（1925年7月25日），《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 第一卷》（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I-4-6-0-1_1_001，頁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網站，Ref.: B04013200400，下載日期：2023年8月15日，網址：<https://www.jacar.go.jp/>。〔按：以下省略下載日期與網址〕。

世界宣稱亞洲門羅主義，戰爭結束前夕卻與敵國德國簽訂秘密條約，意圖讓日、德、俄分割中國，後來巴黎和會上主張人種平等，卻又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並毫不留情地獵殺朝鮮民族，其所作所為看來，日本這次提出亞細亞聯盟到底有無誠意，實在難說。¹⁴一語道破日本組成東亞聯盟的背後，充滿精打細算的政治考量。

此外，1924年6月6-8日、10日《東亞日報》英文欄連載英文社論〈The Union of the Asiatic People〉，道破日本政界近日說要組織亞細亞聯盟，其實都是政友本黨為了拉下護憲三派組成的加藤內閣，才使出的手段；文中直指，目前檯面上不論執政或在野，「沒有一個日本政治家能促進亞洲人民團結。他們只能提供日本人民物質上的樂趣」，¹⁵一針見血暴露當時日本政壇分分合合的政黨鬥爭實況。還控訴日本種種雙重標準，指責日本大張旗鼓地抗議美國排日法案之餘，卻想方設法不讓中國與朝鮮人入境日本，在此情況下，中日朝三地人民如何能相親相愛地團結呢？¹⁶作者續道：「或許，再也沒人能像中國或朝鮮民族般熱切感受亞細亞聯盟的必要性」，但作者堅決反對領導權由日人把持，「我們堅信，只要日本人民不改變政治體制、並不放棄透過武力擴張領土的老舊思想，這個聯盟將不可能被接受」。¹⁷

反觀臺灣方面對排日法案的反應，與朝鮮半島冷眼旁觀大相逕庭。1924年5月10日《臺灣》的〈編輯後記〉提到：排日法案之非正義需要被追究，但這若能刺激到日本殖民政策與日本外交，成為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將可因禍得福。¹⁸美

¹⁴ 〈亞細亞聯盟運動에對하야〉，《東亞日報》，1924年6月8日，第1版。原文韓文，無其他語言譯本，感謝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生崔多蔚協助解讀。

¹⁵ 〈The Union of the Asiatic People I〉，《東亞日報》，1924年6月6日，第3版。

¹⁶ 〈The Union of the Asiatic People II〉，《東亞日報》，1924年6月7日，第3版。

¹⁷ 〈The Union of the Asiatic People III〉，《東亞日報》，1924年6月8日，第3版。其他朝鮮媒體也冷嘲熱諷。1924年6月13日《朝鮮日報》社論直言，日本過去向來是欺壓周邊弱小民族、屈從歐美列強，此次排日法案深受屈辱，才開始提倡亞細亞聯盟，「此等日人行為無非讓人笑掉大牙」。코리아研究所編譯，《消された言論：日本統治下の「東亞日報」・「朝鮮日報」押収記事集 政治篇》（東京：未來社，1990），頁197-199。

¹⁸ 〈編輯後記〉，《臺灣》5:2（1924年5月10日），頁100。臺人私底下對美國排日法案的關注，也可見於《黃旺成先生日記》，1924年5月22日：「東家要葫蘆生介紹潮人琵琶師王姓來彈，裝名士之王少濤全來，夜呼酒菜款之，招張案〔晏〕臣、吳子瑜、蔡遜庭來聽……琵琶師去後，一同環坐開講。子瑜暢談中國官場之腐敗，論及世界趨勢，日米戰爭等等，滔滔不竭」。日米戰爭，即指美國排日法案後，日美衝突一觸即發的緊繃關係。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頁168。

國排日法案對文協臺人宛若一線曙光，臺人固然對其露骨的人種歧視抱懷反感，但口氣中透露著正面心態，既沒有日本般的憤怒與絕望，也沒有朝鮮般的冷漠與譏諷，因為他們從美國排日法案找到一種新的論述對抗切入點，亦即：日本政府若對美國排日法案人種歧視般的對待有所不滿，就該有所自覺，明白自身正長期使用同樣歧視的手法，對待殖民地人民與鄰近亞洲國家，故日本如要避免被他國歧視，就必須從自身做起，率先揚棄種種不公平的殖民地政策。

臺人對美國排日移民法的報導多統一口徑，聚焦人種對立與亞洲團結的問題。1924年4月21日民報編輯後記寫道：「美國排日案通過兩院，亞人全部受同等的待遇了，日本何獨緘口忍辱？請捨年來的謬見而起大亞聯盟共同回復亞人水平線上的位如何？」¹⁹文中呼籲日本國內應該對排日法案同聲抗議以保亞洲人地位，並積極推動亞細亞聯盟。另一篇6月1日民報的社論〈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作者蔡炳曜開宗明義將美國排日法案，定調為美國人對全亞洲人展現出的人種偏見，認為這是亞洲人民都該關心的議題，然日本國內未提具體對應方案，亞洲其他國民也冷眼旁觀，令人不可思議；他一方面呼籲全亞洲人應當趁此團結，認為此為「日本實現亞細亞的盟主之絕好機會」，鼓動日本國內同仇敵愾、並引領亞洲其他民族與白人世界對抗的情緒；另一方面要求日本若要實現以上目標就必須反求諸己，解放國內被殖民者，不要讓國內朝鮮人與臺灣人遭受同樣歧視，如此才能冀望亞洲民族團結，對抗歐美勢力。²⁰

然而須留意的是，蔡的出發點，雖來自早日實現殖民地人民平權的期待，最終摹畫的卻是日本作為盟主，起身帶領全亞洲人民起身對抗白人勢力的理想藍圖。這番話或許多少存在「激將」成分，但對於日本擔任亞洲盟主並未太多懷疑。當然，也有人早前即已意識到日本大亞細亞主義問題，如陳逢源在1922-1923年曾發表文章，明言不信任大亞細亞主義，並指出亞細亞復興運動的基調與同化主義相互矛盾，唯有支持各地民族自治，而非同化，才能凝聚眾人力量。²¹奇妙的是，這些論點在1924年臺人對美國排日法案進行相關輿論操作時，像被特

¹⁹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2:7（1924年4月21日），頁16。

²⁰ 一舟，〈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臺灣民報》2:9（1924年6月1日），頁1。

²¹ 參見陳逢源，〈最近世界の潮流を洞察せよ〉，《臺灣》3:3（1922年6月12日），頁19-23；陳逢源，〈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臺灣》4:1（1923年1月1日），頁18-33。

意忘卻似的，未曾被提及。

民報論者將美國排日法案事件，明白定調為黃種人與白種人的對立。甚至為了加強論述，大量轉載日本國內批評美國排日法案是人種歧視的文章。然而，若仔細對比譯文與原文的思想脈絡，會發現兩者存在一定的歧異，甚至出現原文在翻譯的過程中被刪節、或被去脈絡化的現象。

例如民報刊登兩篇翻譯自同年《改造》6月號的文章，訴求成立亞洲民族為主體的東洋人聯盟，團結亞洲人民。其一是印度獨立運動家拉希·比哈里·鮑斯（Rash Behari Bose）²²的〈東洋人聯盟的目標〉，當中提到，排日法案點破日本在白人眼中「也是有色人種、劣等人種」的事實，故維繫國際和平，唯有組織東洋人聯盟，利用東洋人在精神、道德方面的長處，「更進而教化白人，再鑄造白人做新的正義人」，此乃「東洋人的使命，東洋人聯盟就是要遂行這個使命的手段了。」²³另一篇名千葉氏的〈日本對同色民族要悔悟了〉則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壓迫，反使有色人種民族自決意識高漲，「說是他們所抱的生有競爭的敵意，反使朦朧的有色人的自覺的結合，更加明瞭哩，俗說艱難能生幸福，陷落深地，沒有生存餘地的人種，其團結力定必彌堅固。十一億五千萬的有色人，定難忘去被人看做劣等種類久被白人虐待的過去歷史」，故會齊心開發土地與富源；最後並呼籲：「日本國民必要放棄無用之國民的優越感、和不平等觀念的非理，而悔悟於同色民族的面前才是哩。」²⁴以上譯文的論點，皆把美國排日法案視為對全體黃種人的歧視，力陳日本若苦嚙美國排日法案的種族差別待遇，則要放棄國民優越心理，起身與所有東洋有色人種站在同一陣線。

但要留意，上述兩位原文被民報轉載時曾被刪節。前者鮑斯原文最後有一句：「引用世界偉人西鄉隆盛詩中一節來點破東洋人的使命：月自東洋照西

²² Rash Behari Bose (1886-1945)，1910年代印度獨立運動指導者之一，主導數個謀殺印度官員的恐怖攻擊事件（如印度總督哈丁被炸事件）而被通緝，1915年匿名逃亡至日本，受日本黑龍會的頭山滿與內田良平協助，後歸化日本籍，並以日本為據點進行反英獨立運動。早期他批評日本對中國的種種掠奪政策，1930年代後，隨著東亞戰事爆發，他意識到日本的強盛是帶來印度獨立革命的唯一可能，轉而贊成日本解放亞洲，支持日本進出中國與大東亞。鮑斯生平參閱中島岳志，《中村屋のボース：インド独立運動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東京：白水社，2005）。

²³ アルビーボース，〈東洋人聯盟的目標〉，《臺灣民報》2:11（1924年6月21日），頁9。原文為アル・ビー・ボース，〈東洋人聯盟の目標〉，《改造》6:6（1924年6月），頁83-85。

²⁴ 千葉氏，〈日本對同色民族要悔悟了〉，《臺灣民報》2:11（1924年6月21日），頁10。

洋」，民報省略未翻。²⁵ 後者千葉的文章，原文來自文藝評論家千葉龜雄刊登於《改造》6月號的評論，原題為〈血は水よりも濃い〔按：血濃於水〕〉。民報轉載翻譯後，作者全名被隱去，文章名稱也被改得面目全非，譯文也被刪節。例如譯文「說是他們所抱的生有競爭的敵意，反使朦朧的有色人的自覺的結合，更加明瞭哩」之後，原文其實還另有一段話：「血は水よりも濃い。諺にも親類は泣きよりである〔按：血濃於水。俗語亦言，自家人才會感同身受〕。」²⁶ 這段話卻在中文翻譯裡消失了。不難想像，對於反對內地延長主義與同化政策的民報論者們而言，「血濃於水」這句話，無疑觸動了他們敏感的政治神經，故刪節，只留下臺人所需要的論點。²⁷

此外，鮑斯與千葉氏的文章，實出自該號「東洋人聯盟批判」特輯。翻開此特輯可以發現，所有文章都是反對檯面上組織東洋人聯盟的聲浪。論者使用的語彙包括東洋人聯盟、東洋聯盟、亞細亞聯盟等，名稱各不相同，但都是指涉美國排日移民法之後愛國主義者倡導有色人種以日本為首、團結組織起來的概念。細看《改造》特輯，首篇的安部磯雄〈東洋人連盟必要なし〉即直言，雖明白日本國民對美國排日法案之不公平感到憤怒，但絕不可因此就嚷嚷著組織東洋人聯盟。²⁸ 安部認為，美國排日法案是土地所有者與租借者之間不對等的關係所引發出來的問題，只要土地私有的現象存在，土地所有人可以恣意選擇對象租借的情

²⁵ アール・ビー・ボース，〈東洋人聯盟の目標〉，頁85。

²⁶ 原文為千葉龜雄，〈血は水よりも濃い〉，《改造》6:6（1924年6月），頁86-87。日文原文：「けれども彼等の生存競争に採り上げた敵意が、陽わになる程度と比例して、今までもうろうであつた有色種類の自覚と結合を、極めて明確にさして行くといふ、恐ろしく皮肉な作用を見通していかない。血は水よりも濃い。諺にも親類は泣きよりである。また艱難〔按：可能為「艱難」之誤字〕は幸福を生む。空地に落され、生存を奪はれた人間ほど、團結力の固いものは無いのである。」。畫線處未見於民報譯本。

²⁷ 同時期臺灣民報的論說皆主張同化主義之無用，在在強調臺人與日人民族不同、同化不可。例如蔣渭水曾以美英同種卻分離，奧匈不同種卻結合為例，指出：「可知道國家的組織，不在民族之異同而在利害關係之一致，若利害關係一致，雖是異民族，也可以組織國家，若利害關係不一致，雖是同民族，也是不能成立國家……（如美國之獨立）……所以同化不同化，在國家形成上，並沒有什麼意義」。蔣渭水，〈駐華美公使之愚論〉，《臺灣民報》2:10（1924年6月11日），頁4。黃呈聰亦在護憲三派贏得勝利後，認為其輿論獲得民心使得勝利，並言：「前首相原氏標榜帝國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繼續于今，欲使臺灣化作與內地的府縣同樣，這實在是難的，若要達其目的，總要生出種種的強制，無視臺灣的個性了」。劍，〈對護憲內閣的希望：要更新植民地的統治方針〉，《臺灣民報》2:11（1924年6月21日），頁1。

²⁸ 安部磯雄，〈東洋人連盟必要なし〉，《改造》6:6（1924年6月），頁81-82。

況自然不會消失；且數年前日本政府也曾命令一百七十名中國商人返國，由此可知排日問題的癥結不在人種對立，而是在於資產分配的公平正義可否實現，因此組織東洋人聯盟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同特輯中，平林初之輔也以〈不可能な幻想〉為題，直指東洋人聯盟無法解決排日法案，問題在於美日經濟關係的不平衡。文章批評日本過去同樣對東亞弱小國家不假辭色，沒有立場去要求美國平等對待，並點出當前外交局勢就是暴力外交，經濟大國支配一切乃是必然；當前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在生絲與茶等奢侈品，但日本對美國貿易逆差的是卻是鐵、棉花、石油、機械等對重要物資，故日本政府只能繼續對美國低頭；「只有那些靠戰爭發財的高級將領與支那浪人，還有那些搞不清楚狀況的豪傑們，腦子才會生出東洋人聯盟這種不可能的幻想」。²⁹

既是詩人亦是社會運動家的秋田德三則明確點出，「目前東洋聯盟（或稱亞細亞聯盟）的思想體系是由兩種完全悖反的勢力揉合而成」：一個是哲學式自由主義的觀念，另一個則是東洋國家主義對西洋國家主義的衝撞。若東洋聯盟的思想由前者構成，自能實現人類解放運動；但若由後者構成，不但會對東洋人的災難，更會讓全人類帶向新的爭鬥，「若日本人不丟下自己的國家主義，而是抱懷著成為武力盟主的野心而主張東洋聯盟，將加速日本民族的自我毀滅」。³⁰

延續此脈絡重讀鮑斯原文，會發現其立場是：東洋聯盟需有教化白人的宏觀視野，而非流於眼前狹義的反美。這說明鮑斯為何引用西鄉隆盛詩句「月自東洋照西洋」做結。

另，千葉原文則批評：有色人種遭受白色人種的壓迫，會因「血濃於水」而愈發團結、自行展開各種資源與土地的開發，終有一日得以避免白人的剝削與入侵，這是東洋人至上的幸福。但最後筆鋒一轉，狀似無奈、實則諷刺地寫道：「（白人與有色人種）兩大民族對立並不樂見。但只要白人始終抱持此種（排他）心理，彼此間敵意就會被白人的自我慾望挑起，無可奈何。此時，在同色民族前，懺悔著過去無用揮灑的國民優越感和不平等觀念之不合理的，就不是美

²⁹ 平林初之輔，〈不可能な幻想〉，《改造》6:6（1924年6月），頁85。

³⁰ 秋田雨雀，〈聯盟に就ての二つの母体〉，《改造》6:6（1924年6月），頁85。

國，而是日本了。」³¹ 千葉看似贊成亞細亞聯盟，實則是諷刺目前檯面上倡議亞細亞聯盟的想法，因為：有色人種得以遠離白人的代價，竟是讓同為有色人種的日本成為剝削同色民族的一方。

然而，民報的譯文，翻譯了有色人種逃離白色人種壓迫，積極團結，開拓土地資源，此乃東洋民族之幸福云云後，卻漏翻了兩大民族因白人自我慾望對立而無可奈何的文意，直接跳至最後一段日本需悔悟於同色民族前云云作結。雖然原文與譯文，日本須對同色民族懺悔的結論並無二致，不過原文的論述，乃用極其反諷的方式，將日本國內高唱亞細亞聯盟論的觀點，徹底調侃了一番。然而，這些極具諷刺性內容，在民報裡卻顯得過於平鋪直述，譯文不但少了先前「血濃於水」這個在原文裡充滿反諷意義的符碼，連結尾對兩大民族勢必對立的調侃、以及被日本比下去的美國等文字都消失了。另外，民報譯文中提到「放棄」無用的國民優越感。「放棄」一詞，並未出現於原文當中，而是譯者自行加上去的。如此刪節後的文章結構，竟轉化成一種直白的認同——即認同日本主導亞細亞聯盟的成立——因為在當前白種人仇視有色人種的潮流下，亞細亞聯盟是必然出現的時代結果；而日本屆時在這潮流下，勢必要放棄國民優越感、悔悟於同色人種前，才能繼續引領。

以上可知，《改造》論者與殖民地臺灣出身的民報論者們，對排日法案的認識與國內成立東洋聯盟的聲浪，存在著不同角度的思考。《改造》論者反對美國排日法案所激起的東洋聯盟構想，認為排日法案的癥結在於階級問題與美日國際外交局勢現實的無奈，不可冒然矗立人種對立大旗、以暴制暴。但民報論者卻統一口徑，強調排日法案暗喻的黃、白人種對立終不可避，大聲疾呼建立亞細亞聯盟，企圖藉此讓日本正視東洋民族團結合作、解放弱小民族的必要，而未曾懷疑亞細亞聯盟本身可能因日本主導而失真。正因如此，才會在援引相關言論時，出現一種平板化、甚至是去脈絡化的傾向。

³¹ 原文為千葉龜雄，〈血は水よりも濃い〉，頁87。日文原文：「二大民族が永久の敵意が好ましくないのだが、しかし、白人がいつまでもその心理を採る限り、其の敵意を挑戦したものが、白人の自我慾にあるのだからどうともし得ない。そこでこの場合、これまで無用に振りまわした、国民的優越感や、不平等觀念の非理を、ことに同色民族の前に悔悟せねばならぬものは、アメリカでなくて、日本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畫線處未見於民報譯本。

（二）特定與重複的轉載

民報的討論慾望，還可以從重複轉載、翻譯特定作品中一窺端倪。

民報 6 月 11 日報導提到，「印度獨立運動之至要人物陀斯氏對本社記者發表其對米國排日案的意見如下」，指美國排日法案乃西洋帝國主義與好戰主義的表現，不單是排斥日本，而是排斥全亞洲人之大規模計劃的一小部分，唯有各個亞洲民族團結、「創造亞細亞自由國民的聯盟」才能自救，若各個亞洲民族甘於屈服於白人優越統治下，全亞洲將不得不繼續承受被壓迫的痛苦。³² 文中的印度民族運動家陀斯（1870-1925，Chittaranjan Das，一般多寫為 C. R. Das），曾在 1922 年 12 月加雅議會發表演說，表明支持泛伊斯蘭主義運動（Pan-Islamic movement）所提出的大亞細亞聯邦（The Great Asiatic Federation），認為該運動出發點雖然狹隘，但不得不承認，印度與其他受壓迫的亞洲民族之間，的確需要存在「友誼與愛、同情與合作的紐帶（a bond of friendship and love, of sympathy and cooperation）」，唯有建立紐帶才會帶來世界和平，「在我看來，世界和平意味著每個民族的自由，我更進一步說，當有任一國家受束縛，地球上就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真正自由」。³³ 由此可以理解陀斯在排日法案公開後，一再強調亞細亞聯盟重要性的心境。

然回頭看民報報導，就時空背景而言，當時民報記者與身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如火如荼進行政治運動的陀斯，雙方直接面對面交流訊息，實無可能。該篇報導比較可能的情報來源，應該是不久前刊登在 5 月份《日本及日本人》的專題〈眠れる大亜細亜の覚醒と白色侵掠の拒否〉，著者不詳，但該文列舉近日印度國民議會議長穆罕默德阿里、印度詩人泰戈爾與印度獨立運動家陀斯等人對美國排日法案的批評，其中陀斯的引述，恰恰與民報的引用內容完全一致。³⁴ 令人玩味的是，該文內容似乎深受民報編輯認同，因為王敏川之後又在 7 月 1 日將該文

³² 〈亞細亞人當聯盟對抗白人之橫暴〉，《臺灣民報》2: 10（1924年6月11日），頁13。

³³ C. R. Das, Non-cooperation and Council-entry, Verinder Grover, ed., *Political Thinkers of Modern India Vol. 22 Chittaranjan Das* (New Delhi: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1993), p. 112.

³⁴ 〈眠れる大亜細亜の覚醒と白色侵掠の拒否〉，《日本及日本人》48（1924年5月15日），頁2-5。其中，「印度國民議會議長穆罕默德阿里」之日文原文為「印度国民議會議長モハメッド・アリー」，王敏川譯為「印度國民議會議長暮下墨魯·阿厘」。是否指 1906 年加入印度國民大會黨、後轉而追求巴基斯坦建國獨立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l, 1876-1948）。真實身分待考。

以〈由酣睡中大亞細亞的覺醒和白人侵掠的抗拒〉為題，全文翻譯、重新刊登，陀斯則被譯為「印度獨立巨頭施阿爾泰斯」，這篇譯文於文末強烈主張組織屬於亞細亞人的聯盟，認為這是亞細亞人的自衛，也是回歸和平的唯一保障。³⁵ 同樣文章、重複摘譯，甚至將第三者的報導變成面對面與當事人交流的內容，³⁶ 也可說是反映臺人論者積極推動、加速亞細亞聯盟輿論成形的慾望。

另外，民報 6 月 21 日翻譯石崎東國〈人種問題和亞細亞文化聯盟〉一文，該篇原文刊載於同年 5 月《日本及日本人》。³⁷ 內容提到美國排日法案的根本目的，「是在要驅逐東洋全人種，即這問題由於人種的憎惡來的」，並提到美國過去從黑人到中國人，驅逐外來人種的不良紀錄其來有自，故亞洲人需自救，因為「排日不是僅排日，是壓迫最後的東洋人，日本亦不單是日本民族，為亞細亞民族，始能獨壯起來，我們為亞細亞文化聯盟的主唱者，為民族共通的利益，須要奮鬥」；³⁸ 並重申，排日絕非僅僅是排解人口移入的經濟層面問題，而是「有色人種對白色文明的對抗問題」，故需要有色人種齊心協力，才能共同復興亞細亞。³⁹

然而，石崎提倡的人種對立說，若放在石崎本身獨特的思想背景下重新觀察，可以有另一層不同的解釋。石崎東國（1873-1931），陽明學研究家，早年參加東亞同文會，1899 年庚子拳亂後赴清，1901 年回國定居大阪，因目睹大阪勞資對立問題嚴重，從日蓮與大鹽平八郎的新平民主義獲得啟發，轉而研究大鹽的儒學思想。⁴⁰ 石崎東國於 1920 年發表《中齋大鹽先生年賦》，盛讚大鹽之亂是果敢

³⁵ 錫舟，〈由酣睡中大亞細亞的覺醒和白人侵掠的抗拒：「白人米國」的建設和排日案〉，《臺灣民報》2: 12（1924 年 7 月 1 日），頁 5-6。此外，日文原文最後兩段是對清浦內閣的批判與對總選舉的冀望，民報翻譯刊登時因為 1924 年 5 月 10 日第十五回眾議院議員總選舉已過、清浦內閣已下台，內容失去時效性而未翻。

³⁶ 這則民報記事也可能是因為直接轉譯日文報導，所以連記者報導口吻都照本宣科。無論如何，應不可能是民報記者直接從陀斯口中得到的訊息。

³⁷ 石崎東國著、錫舟譯，〈人種問題和亞細亞文化聯盟〉，《臺灣民報》2: 11（1924 年 6 月 21 日），頁 6-8。原文為石崎東國，〈人種問題と亞細亞文化聯盟〉，《日本及日本人》48（1924 年 5 月 15 日），頁 70-75。

³⁸ 石崎東國著、錫舟譯，〈人種問題和亞細亞文化聯盟〉，頁 7。

³⁹ 石崎東國著、錫舟譯，〈人種問題和亞細亞文化聯盟〉，頁 7。

⁴⁰ 石崎東國生平年表，參照石崎東國，〈予の王学に入りし径路〉，收於石崎東國，《陽明学派の人物》（大阪：前川書店，1912），頁 168-176。關於石崎東國其人可參考荻生茂博、森田康夫、吉田公平之研究。

彰顯「弔民王道之大義」的行動；⁴¹ 1924年又發表一篇〈大鹽平八郎 太平天国の建設者大鹽格之助〉，主張大鹽平八郎與其義子格之助並未死於動亂，而是逃往清朝，義子格之助正是後來太平天國起義者洪秀全云云，甚至煞有其事地考察大鹽父子動亂中的逃亡路線與洪秀全的日本特質，如不剃髮及詔書文體、年號、用兵戰術很日本等。⁴² 這種稗官野史、穿鑿附會的觀點，不免荒誕。但石崎意圖將大鹽傳說化，若放在當時「大正維新」的風氣下檢視，不難感受他有種企圖從大鹽思想尋找解方、解決眼前日本因過度西化而導致種種社會問題的迫切心態。⁴³

靠「復古」來「維新」，同時也體現在他對亞洲現狀的認識上。石崎於1926年發表〈南洲先生を今に在らしめば〔按：南洲先生今若在〕〉，認為眼下亞洲復興必須建立在西鄉隆盛王道思想的實現上。⁴⁴ 該文指出，幕末有西鄉隆盛與勝海舟持王道思想，才順利無血開城、重啟日本新局，未讓無謂的戰爭荼毒天下蒼生；如今歐戰後國際情勢動盪不安，白人勢力入侵亞洲，為亞洲各國帶來無盡黑暗，故倚靠西鄉隆盛的王道思想，才能讓亞洲不動干戈地和平脫離白人控制，重回東洋人自身手中；復興亞洲與維新東亞也正是南洲先生的理想，想當年他主張征韓不是為了取得朝鮮，無非是唯恐俄國白人勢力南下，才為了實現「亞洲人的亞洲」的理想。⁴⁵

換言之，從石崎的思想體系重新思考他所主張的亞細亞文化聯盟，可以說是由日本帶領亞洲各國、對外抵抗白人勢力的亞細亞聯盟，但亞洲各民族內部之間是否能與日本平起平坐，這點完全未被考慮。民報翻譯這篇文章時，對於石崎東國論述背後的複雜立場是否理解或認同，筆者無從判斷，但光是在當時眾聲交響的日本輿論之中，民報卻獨獨選擇轉載這篇鼓吹亞細亞聯盟的文章，這點頗富深意。若非完全認同日本右派亞洲主義者的想法，就是極欲傳達文章字面意思、而未深究亞細亞聯盟由日本主導與否之差異，間接展現民報譯者的轉載翻譯慾望。

⁴¹ 宮澤誠一，〈「起源神話」としての明治維新：大逆事件の衝撃と波紋〉，《教養研究》（北九州）15:2（2008年12月），頁5-27。

⁴² 石崎東國，〈大鹽平八郎 太平天国の建設者大鹽格之助〉，收於國史講習會編，《國史上疑問の人物：忠臣か逆臣か實在か傳説か》（東京：雄山閣，1924），頁84-108。

⁴³ 吉田公平，〈石崎東國と大阪陽明学会の創設の頃：大阪における大塩平八郎〉，收於大塩事件研究会編，《大塩平八郎の総合研究》（大阪：和泉書院，2011），頁293-315。

⁴⁴ 石崎東國，〈南洲先生を今に在らしめば〉，《日本及日本人》89（1926年1月1日），頁52-56。

⁴⁵ 石崎東國，〈南洲先生を今に在らしめば〉，頁55。

民報論者對輿論的操控，也可以從與朝鮮半島的比較中，看出臺、朝兩者政治光譜的差異。同樣作為被殖民者，朝鮮半島對排日法案的看法與後續亞細亞聯盟的成立，一直抱持著自覺自警的淡漠、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評，與臺人論者的一頭熱，呈現極大反差。如前所述，朝鮮記者砲火強烈，直言中國與朝鮮不承認日本成為亞細亞盟主，亞細亞聯盟若由日本帶領，絕對無法實現弱小民族的公平正義。相對於此，民報論者在輿論上積極鼓勵日本成立亞細亞聯盟，並一再呼籲公平對待殖民地朝鮮與臺灣，但亞細亞聯盟該由誰當老大卻未具體提及，也未如朝鮮記者直言日本政局發展與亞細亞聯盟背後中日朝利益糾葛。1924年期間民報論者對亞細亞聯盟的支持，始終停留在日華親善缺少不了臺人作為模範、臺灣是日華親善橋樑之類的說辭，口氣相對溫和，甚至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他們對日本政界的未來與臺灣議會運動的成功，抱懷一種諄諄善誘的樂觀期待。與朝鮮記者自始至終不留情面、大肆攻擊的模樣，形成耐人尋味的對比。⁴⁶

三、臺人對孫文大亞洲主義的解讀

(一) 孫文「大亞洲主義」講稿版本的歷史公案

臺人不斷鼓吹亞細亞聯盟論，然而等到同年9月以後日本國內對亞細亞主義和亞細亞聯盟的支持到達高峰，甚至10月《日本及日本人》出現專刊討論，面對愈發豐富的報導材料，照理應有更多鋪陳與介紹，但民報未進一步轉載更多日本國內成立亞細亞聯盟的相關意見，⁴⁷取而代之是討論東洋人種、有色人種的大量

⁴⁶ 當然，我們可解釋民報論者為避人耳目而未明確表態，甚至可視為一種以退為進的穩健話術。但值得注意的是，將臺灣未來放在日本政局有所改變的預期心理，同樣可見於臺人對護憲三派加藤內閣的報導。臺灣民報在護憲三派獲勝後，曾用正面的態度支持護憲三派，認為其閣僚不分黨派，「國民喜此三黨皆棄自黨的小我、而就國家的大我，各不偏執黨利聯立組織，這是憲政史上可以特筆的」，認為其實真正護憲精神；但同時也對護憲三派宣言政綱對殖民地問題隻字未提感到遺憾，對此論者緩頰內閣成立初期或許尚無暇顧慮，並冀望今後會表達對殖民地意見，順應世界潮流支持臺灣自治，最後不忘疾呼：「臺政的如何，關於日中的親善很大，臺政的革新，是為東洋平和的第一步」。字裡行間充滿臺人對日本國內政局出現轉機、進而帶動殖民地政治發展、牽動臺灣總督府施政方針的隱隱期盼。劍，〈對護憲內閣的希望：要更新殖民地的統治方針〉，頁1。

⁴⁷ 僅1924年9月11日有一則在上海由亞細亞協會與上海經濟日報發起之亞細亞問題大講會的報導。

評論。⁴⁸等到再次出現附和亞細亞聯盟論的意見，則是1925年1月以後，關於孫文訪日演講大亞洲主義的報導。⁴⁹

1924年11月，孫文訪問神戶，發表著名的「大亞洲主義」演講，演說指出：亞洲長期受歐美支配，直到日本崛起，才燃起亞洲有色人種信心；歐美列強對亞洲的侵略是霸道，亞洲價值在於「王道」；日本之所以成功，在於學習歐美「霸道」，如今應回歸自身立足的亞洲；俄國也因推崇亞洲王道而受歐美排擠，故亞洲諸國應與俄國團結、共同對抗歐美。藤井昇三指出，孫文訪日期間演講大亞洲主義，主要目的是要求日本撤除不平等條約，而非附和日本國內大亞洲主義的言論，但當時日本媒體僅著眼兩者共通點就大肆歌頌，實際上並未理解孫文對日本的訴求，恰恰印證了不論在當時或日後的日本，都沒有理性理解孫文演講真意的思想空間。⁵⁰

然而，這場演講卻衍生出另一場歷史公案。後世史家比對中日兩方報章雜誌刊載的演講稿，發現兩者內容有出入。同時期中國媒體刊載的演講稿，明白指控日本帶頭對亞洲各國進行剝削，呼籲日本勿做「西方霸道之鷹犬」，⁵¹但這段內容卻未見於同時間日本國內報紙刊載的任何演講速記稿。孫文是否在演講中展現出批評日本的政治立場，成為日後學者們爭論的焦點。認為孫文未明言批評的安井三吉提出幾項證據。最具說服力的是，根據日本現場聽眾與事後媒體對孫文高度肯定的一致態度看來，孫文本人或是擔任口譯的戴季陶，極有可能在演講當下避重就輕、並未詳實講出或譯出最後指責日本的內容。且演講前天11月27日，

⁴⁸ 〈東洋諸民族的覺醒（其一）〉，《臺灣民報》2:20（1924年10月11日），頁10-11；〈東洋諸民族的覺醒（其二）〉，《臺灣民報》2:21（1924年10月21日），頁13-14；〈東洋諸民族的覺醒（其三）〉，《臺灣民報》2:22（1924年11月1日），頁10；〈東洋諸民族的覺醒（其四）〉，《臺灣民報》2:24（1924年11月21日），頁14-15；〈有色人種的抗義〉，《臺灣民報》2:24（1924年11月21日），頁8；前非，〈黃色人種應該着覺悟嘍！〉，《臺灣民報》2:24（1924年11月21日），頁5-6。

⁴⁹ 此時之所以出現訊息空白期，或許是1924年7月民報編輯移回臺北，僅在日本印刷，資訊取得的時效性與來源，因物理空間變化而受限；又或是治警事件相關裁判結果出爐，報導重心被轉移。原因不明，待進一步考證。

⁵⁰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勁草書房，1966），頁274-277。

⁵¹ 黃昌毅，〈孫先生「大亞洲主義」演說詞〉，《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12月8日，收於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頁55-65。

朝鮮《東亞日報》特派記者尹洪烈對孫文的講題提出質疑，認為大亞洲主義無法解決目前朝鮮問題，孫文答道：「當然不能兩全，但在日本，我希望迴避討論朝鮮問題」。⁵² 演講隔日專訪孫文的神戶當地英文報紙 *The Japan Chronicle* 記者也寫道，孫文過去曾與日本敵對，激烈批判日本侵略中國，但眼前的孫文卻說：「現在不想觸及此事」。⁵³ 這些證據都指向孫文演講席上很有可能「脫稿」演出、未針對日本蠶食中國做出敏感的批評，才讓戴季陶須要於隔年 3 月另外投書《改造》，批評日本東洋政策，藉此重申孫文立場，避免誤會。⁵⁴ 研究戴季陶的嵯峨隆也支持孫文演講時曾有「自主規範」的行為。因為當日兵庫縣知事致若槻禮次郎內務大臣報告書附有演講內容摘要，未發現最後一段具爭議性的內容，⁵⁵ 戴季陶也不可能僅憑一己判斷、省略不翻，故最有可能的，還是孫文當日演講未提及，回到中國才在中文版追加或回復了最後一段批判性言論。⁵⁶

換言之，日本國內輿論對孫文演講之所以會淪為片面性的解釋，不僅僅起因日本媒體本身未深刻了解孫文整體思想脈絡，更要歸咎他演講時，有避重就輕之嫌。⁵⁷ 孫文結束訪日抵達天津後，面對記者時才確切提道：「中國問題只需排除

⁵² 安井三吉，〈講演「大亞細亞問題」の成立とその構造〉，收於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頁 15。該報導為〈三民主義 旨力説〉，《東亞日報》，1924年11月30日。

⁵³ 安井三吉，〈講演「大亞細亞問題」の成立とその構造〉，頁 15。該專訪刊登於 1924 年 12 月 2 日 *The Japan Chronicle*。

⁵⁴ 安井三吉，〈講演「大亞細亞問題」の成立とその構造〉，頁 33。安井認為，孫文選擇避談，可能與 10 月剛發生馮玉祥主導的甲子兵變，孫文加入的反直三角同盟背後有日本支持有關。且孫文 1924 年 11 月抵達日本後，未能如願與犬養毅、澀澤榮一見面；與頭山滿會談時，又被叮囑演講時切勿提及要求日本退出滿蒙等刺激性的言論；加藤高明內閣官員們對他訪日也極為冷淡，這些突發的變數，可能導致他在最後演講時，決定採取不直接刺激日本聽眾的立場，避談對日本的批評，以便獲得日本方面更多支持。

⁵⁵ 〈神戸滞在中ノ孫文ノ動静並ビニソノ講演要旨報告ノ件〉（1924年11月28日），收於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大正期 大正十三年第二冊》（東京：外務省，1981），頁 574-577。

⁵⁶ 嵯峨隆認為，孫文固然在演講當中提到要解放亞洲被壓抑的弱小民族，但這些仍不及中國擺脫列強控制重要，故孫文的立場終究是以本國革命為優先、企圖透過依存強國來達到民族解放，而非完全反帝國主義；且演講中他未強力批判日本，這意味孫文訪日期間並未採取徹底反日的態度，仍對日本抱懷期待，反映他一直以來的特徵：強國依存傾向；另外，這場演講對孫文而言，最大的意義在呼籲日本促進日中俄的三方合作，希望集結被排除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之外的國家，這也正是戴季陶之後提倡「大陸同盟說」的原點。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頁 166-169。

⁵⁷ 對此有史家提出異議。高網博文延續藤井昇三的論點，認為不論演講中明言批評日本政府與否，都不影響孫文反帝國主義、反日的基本路線。高網博文，〈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講演をめぐる

歐美壓迫，自然能解決……眼下日本自傲成為世界三大強國，但思想等其他方面盡拜歐美後塵，原因在於日本忘卻自己腳下的亞洲，故日本此際要儘速回歸亞洲，吾認為首要之務，當承認蘇俄。」⁵⁸ 無奈孫文這番事後真心話，雖簡短見於日本報端，但日本國內已然一片高呼亞細亞聯盟之聲，細思孫文真意的思想空間已不復在。

（二）臺人對孫文講詞的刻板理解

過去研究認為臺人對亞細亞主義的唱和，是追隨同時期孫文大亞洲主義的立場。但根據上述背景，會發現孫文發表的大亞洲主義，有可能因資訊誤差而衍生迥然不同的解釋，故以下將重新探討民報對他訪日的一系列報導與反應，進而理解當時臺人對日華親善與亞洲聯盟的認識。

民報轉述孫文對日言論，最早是 1924 年 5 月 11 日〈孫氏排日觀〉，內文參照《東京朝日新聞》報導。⁵⁹ 文中引述孫文認為美國排日法案突顯「白色人種的橫暴」，「而日本奮起為亞細亞民族團結，圖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來的希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歐米之後塵，不但不留意於亞細亞民族的團結問題，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日本此回受了美國排日教訓，「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於亞細亞民族的大同團結、依賴其勢力之外、再沒有法子了。」⁶⁰ 民報記者續評論，「以上所說的是孫文氏的意見，他對於民族團結的主張，是始終一貫的」，最後呼籲日本國民「如果有心於東亞的團結，須要對於中國的問題、朝鮮臺灣的問題，先解決妥當才成了。」⁶¹ 民報記者藉由排日法案的黃種歧視問題，強調亞洲

て：《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を中心に，《歴史評論》（東京）494（1991年6月），頁65-80。安井三吉則重申，無論反帝反日與否，孫文的確在演講中進行了「自主規範」、自行檢閱刪除不宜的內容，這種自主規範意識本身，才是重新思考孫文日本觀和帝國主義觀的重要線索。安井三吉，〈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の研究を深めるために：高網博文氏の批判に寄せて〉，《歴史評論》498（1991年10月），頁77-90。

⁵⁸ 〈日本は亞細亞に帰れ まづ露國を承認せよ 孫文氏天津で語る〉，《大阪毎日新聞》，1924年12月7日，轉引自陳徳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頁106。

⁵⁹ 〈孫氏排日觀〉，《臺灣民報》2:8（1924年5月11日），頁7-8。內文引用自〈亞細亞民族の大同團結を圖れ 孫文氏語る〉，《東京朝日新聞》，1924年4月25日，第2版。

⁶⁰ 〈孫氏排日觀〉，頁7。

⁶¹ 〈孫氏排日觀〉，頁7-8。

民族需要團結，進而呼籲日本率先與周邊民族和解，延續同時期臺人鼓吹亞細亞聯盟一貫的邏輯論調。

待孫文訪日結束後，隔年（1925）1月1日和11日，民報陸續翻譯《大阪每日新聞》〔按：以下簡稱大每〕、《大阪朝日新聞》〔按：以下簡稱大朝〕對他訪日的三篇報導，這三篇報導都對孫文來訪表現出極大熱情與正面回應，並且重申日華親善與聯合亞細亞民族的必要性。⁶²但同時，字裡行間也可以看出孫文與日本輿論，彼此在想法與價值觀上存在根本歧見。例如譯自大朝的〈對孫文的希望 迎其在神戶寄港〉，文中報導11月24日記者們與孫文在神戶的會談經過，大朝記者高度讚賞孫文日華親善的言論，主張兩國民應站在彼此立場才能落實日華親善的實際作為，但也提到，中國明明國難當頭，國內卻軍閥持續內鬥，「真是日本人所不能了解的」。⁶³大朝記者這席發言，明顯未曾認識到民國初期軍閥割據，不單單來自個人權力私慾，背後牽涉的是列強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鯨吞蠶食的利益結構問題。

又如譯自大每的〈治外法權的撤廢 中國國民的要求〉，文中指出孫文本次訪日主要訴求是撤廢中國與諸國間利權、關稅、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約，關稅與治外法權牽涉國家主權，若尊重中國是獨立國家，自然應當首先改正這些不平等條約，但大每記者話鋒一轉，「現在的中國果然有實現這要求的準備嗎？若撤廢治外法權，能對住在本國外人的生命財產，付與絕對安全的保障嗎？」，「列國決不是無意味要傷中國的主權，不過是要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很顧慮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備，所以有出於這樣不得已的舉動」，故現階段與其對外高唱撤廢不平等條約，不如對內力求改正中國司法制度。⁶⁴大每記者這種「先攘內、再對外」的看法，與企圖透過外交手段來解決國內軍閥問題的孫文，邏輯全然相反。因為根據孫文想法，這些不平等條約才是造成中國國內一團混亂的根源，唯有撤除來自列

⁶² 例如呼應孫文大亞洲主義演說所倡議：「以仁義道德為中心的亞細亞大團結，來對抗歐洲諸國」，並認為「日本的勃興對於同種民族是有付與大大的刺激，關於亞細亞的將來，日本國民的責任是感有愈重大的」。錫舟譯，〈亞細亞民族的團結 日華提携的必要〉，《臺灣民報》3:1（1925年1月1日），頁15-16。原文為1924年12月2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說。

⁶³ 錫舟譯，〈對孫文的希望 迎其在神戶寄港〉，《臺灣民報》3:1（1925年1月1日），頁18。原文為1924年11月25日《大阪朝日新聞》社說。

⁶⁴ 錫舟譯，〈治外法權的撤廢 中國國民的要求〉，《臺灣民報》3:2（1925年1月11日），頁9。原文為1924年12月3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說。

強的不平等條約，才能維持中國國內的獨立運作。⁶⁵ 換言之，即使這些日媒認同日華親善的原則、對孫文來訪大表歡迎與支持，未必代表日媒在處理中國問題上，就會與他意見一致。

站在 1925 年的時間點，民報編輯對日媒的論調是否照單全收呢？雖然民報未曾正面否定，但編輯手法似乎嗅得其不置可否的態度。民報翻譯大朝〈對孫文的希望 迎其在神戶寄港〉時，同一版面也刊載國民黨報《民國日報》社說〈敬告國民〉。該文提到：中國軍閥的存在，與帝國資本主義入侵息息相關，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造成大量失業勞工，失業者成為組成軍隊的要素，進而產生軍閥，帝國主義則利用這班軍閥在政治上發展他們的經濟侵略，造成軍閥間混戰，這種混戰又反過來造成許多失業者成為供給軍閥的軍隊，故解救中國的方法，就是孫文所言：「打倒帝國主義始絕軍閥根據，厲行國民革命必能達自由獨立目的。」⁶⁶ 民報宛如平衡報導，將日中兩方對中國軍閥的理解並置處理，未有進一步的評論，但有心人一讀或可意會：中國軍閥問題本身與帝國主義存在結構性的連結關係，盤根錯節，故孫文認為從根改革才是治本；再與大朝旁觀中國軍閥與內政問題遲遲無法解決的牢騷相互對比，更突顯日本記者對中國問題的認識過於表面與一廂情願。換句話說，這種平衡報導式的手法，本身可解釋為民報編輯對孫文訪日事件的無聲表態：日本輿論界與孫文對於中國問題的理解，兩者存在思想上的巨大差異，故這場演講恐淪雞同鴨講。

然而，正因為民報的翻譯未對日媒有確切的評論，所以也難以斷定民報的立場就是全然否定日媒。原因是，民報臺人對孫文演講內容的理解，存在一種「刻板性」，且內容與日媒高度雷同，以下幾個例子說明。

首先是民報摘譯孫文講詞時，出現了原講稿所不存在的評語。1925 年 2 月 1 日，民報摘譯孫文講詞為〈孫先生的「亞洲民族聯合」演說〉，譯者不明。⁶⁷ 該內容分段結構和措辭語氣與日文版相近，文末未見中文版結語「勿做西方霸道之鷹犬」，也沒運用孫文講稿裡「王道」與「霸道」這重要對比觀念的關鍵字，推

⁶⁵ 〈支那の乱因たる不平等条約の撤廢は日本の援助に待つもの多し 孫文氏語る〉，《大阪朝日新聞》，1924 年 11 月 25 日，第 1 版。

⁶⁶ 〈敬告國民〉，《臺灣民報》3:1（1925 年 1 月 1 日），頁 17。

⁶⁷ 〈孫先生的「亞洲民族聯合」演說〉，《臺灣民報》3:4（1925 年 2 月 1 日），頁 10。

斷是譯自1924年11月29日大朝節錄的演講大意，並參考同年12月3-6日大每連載的演講抄譯全文。⁶⁸ 民報摘譯內容包括：長久以來白種人仗著國力控制支配亞洲有色人種，直到日本崛起，才建立亞洲人民與白種人一較高下的自信；中亞、南亞各國開始覺醒，主動聯手合作，唯獨中國與日本鄰近兩國，仍未聯手以謀有色人種獨立，「這是很奇怪的」；⁶⁹ 亞洲文化以仁義道德為中心，與西方的暴力文化全然不同，亞洲民族學西方暴力文化僅可用於自衛，不可同白種人國家來壓迫他人，唯有以亞洲文化道德為基礎加以西方文化為輔，始能擺脫白種人壓迫。最後並寥寥幾語提到，白種人國家唯一與歐美不同者是蘇俄，他們承認亞洲道德而被白種人同伴們排斥。

民報摘譯既然是精煉日文報導，內容自然只會少、不會多。然而，孫文演講提到中日兩國仍未聯手的段落，只是陳述事實、簡單帶過，未留評論。民報翻譯時，卻憑空多補一句：「這是很奇怪的」。⁷⁰ 這句話並不見於中、日文任一講稿或報導，明顯是民報摘譯時，譯者自行揣度而衍生出的個人感嘆。換言之，民報摘譯這篇報導時，未留意孫文提及蘇俄的理由，也沒發現「王道」與「霸道」在孫文演講內容是重要關鍵字，而是理所當然把孫文演講重心，放在有色人種攜手對抗白色人種、日中兩國務必攜手合作的論點上，才天外加入這句，企圖加強語

⁶⁸ 〈亞細亞主義を高調 二十八日神戸に於ける孫文氏の講演〉，《大阪朝日新聞》，1924年11月29日，第1版；〈大アジア主義〉，《大阪毎日新聞》，1924年12月3-6日，轉引自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頁44-53。兩者講稿對比可知：一，大朝內容較大每精鍊，現場觀眾拍手細節亦未詳述。二，大每連載內容數度強調「王道」一詞，甚至有一個章節題名直接標明「王道文化」，但大朝卻只有一處使用「王道」，其他處則翻譯為「東洋文化以仁義道德為中心」。三，孫文演講提及蘇俄的部分，被大每記者用括號註解的方式寫道「此處孫文還提到蘇俄深知歐洲文化弊害而重視仁義道德，反被歐洲白人視為背叛云云」省略帶過，大朝則是平鋪直述該內容。由此反觀民報，其整體敘述、用字，與大朝較為近似，甚至連「王道」一詞都沒用，明顯是以大朝為基礎再精鍊過後的結果；但少部分專有名詞的排列，又與大每相同（例如點名中亞各國獨立起義的順序與相關敘述）。故筆者推論，該報導翻譯時係以大朝為主，部分段落則參考大每。

⁶⁹ 〈孫先生的「亞洲民族聯合」演說〉，頁10。

⁷⁰ 民報版：「有色種人，既有『獨立』這共同觀念，自然而然聯合起來，可是，中國、和日本這二近鄰，並不十分聯合，以謀有色人種之獨立，這是很奇怪的」。大朝版：「此等の獨立運動は或程度まで互結合せんとしたが唯亞細亞の東において日支兩國の提携は出来てゐない」。大每版：「是等の獨立運動、獨立思想といふのが亞細亞の各民族に起こりまして、さうして西方の亞細亞民族は總て此獨立運動の爲めに結合し、非常に大なる團結運動に着手しつゝ、ある、けれども唯亞細亞の東におきまして、日本と我國とのこの二國の結合、連繫といふのが未だできてゐないのであります」。對照三個版本，可以發現民報版的畫線部分並不存在，也無相關類似文意。

氣、以示重點。這流露民報編輯對日中攜手合作的強烈訴求，顯示民報對孫文此行目的並未深究，而是以既定印象來理解。

民報論者黃呈聰第一時間的反應，也反映出同樣的刻板性。他曾感嘆孫文訪日未受日本朝野重視，但細觀其言，他對孫文訪日目的的理解，始終侷限在倡議日華親善、建立亞洲聯盟的層面，這其實與大朝大每的看法別無二致。一篇〈朝野何其無人呢？〉，黃說道：孫文訪日真意在於日中徹底親善，他的大亞洲主義、日中提攜論都是日本素來支持的，且日本有識者常言，排日法案後，日中攜手才能解決日本自身的人口、糧食問題，既然如此，此次孫文訪日為何不見日本朝野重要人士唱和、共商大計呢？⁷¹又如一篇〈人種偏見的挑發〉，談到美國自排日移民法以來敵視有色人種，近日又軍備行動頻頻，看來日美勢必終將一戰，因此亞洲諸國務必團結自強，切勿自相殘殺。黃最後道：此次「孫中山氏到日的使命在乎提倡亞州聯盟，促我國人士的覺醒，此事如果成立，日中的問題、朝鮮的問題、臺灣的問題，應該自然會消滅。」⁷²黃將孫文此行的目的重點放在亞洲聯盟的建立，認為一旦聯盟成立、亞洲各國願意團結，那日本與中國、朝鮮、臺灣之間種種矛盾自然迎刃而解、不成問題，或者說不再被認為是「問題」。黃延續過去以來民報對孫文主張的既定立場，未想過孫文演說裡為何突然提及蘇俄，也沒意識到孫此時訴諸亞洲聯盟，是一種解決國內問題、突破列強控制的手段，已非目的。

當然，我們可以推論，民報論者是受日媒報導內容誤導，才沒第一時間釐清孫文此行真意；又或者民報論者根深蒂固認為他不可能「媚日」，故能以樂觀正面的態度看待孫文此次訪日。但回想前述朝鮮等外國記者對孫文單刀直入的提問，他們公然質疑孫文講題與言談，為何展現不同以往的親日態度，朝鮮記者甚至毫不留情當面質問孫文；同樣，孫文演講內容傳回中國國內，也引起左派論者憂心批評。⁷³反觀民報臺人，他們面對孫文對日本看似過度推崇、寬容的演講內

⁷¹ 劍如，〈朝野何其無人呢？〉，《臺灣民報》3:1（1925年1月1日），頁4。

⁷² 劍如，〈人種偏見的挑發〉，《臺灣民報》3:2（1925年1月11日），頁8。

⁷³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維經斯基（Grigori Naumovich Voitinsky，中文名吳廷康）以筆名魏琴在《嚮導週刊》撰文批評孫文此行不智，直言：日本高舉「亞洲人是為著亞洲人」的口號，只是為了鞏固在華勢力，在中國境內建立忠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權，聰明如孫文竟不了解箇中道理，孫文此行演說詞固然「使他與日本的軍閥有親近的可能」，但「對於中國民眾及日本的工農們有很大的害處」。魏琴，〈國民會議，軍閥和帝國主義〉，《嚮導週報》97（1924年12月31日），頁809-810。

容，當下未表任何質疑與異議，而是一片正面肯定；且同時間，民報仍持續翻譯強調日華親善、人種團結的文章。⁷⁴而翻譯這些文章的王敏川，甚至在2月發表〈確信臺灣議會設置的實現〉，強調臺灣議會設置權限與帝國議會不同，兩者並不衝突；讓臺灣住民參與立法、實現政治理想，既可完成內臺人融合，又可「促進日華親善」、「或為東洋平和的前途打算」；人民參政是世界趨勢，臺灣議會運動是穩健與合法的運動，絕非意圖挑戰日本政府，內地人士勿杞人憂天，望賢明政治家接納云云。⁷⁵換言之，此時此刻，民報論者仍一如既往認為，議會請願運動奉為圭臬的日華親善論大有可為，深感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必須建立在日華親善的理論框架下才能成功，故不覺孫文的內容有何不妥。

這也呼應上一節的分析：臺、朝雙方對美國排日法案所引起的亞細亞聯盟效應，反應為何如此迥異。因為朝鮮民族運動家一開始就否決日本主導亞細亞聯盟的可能性，他們明確認知這無法解決朝鮮半島受殖民的困境，甚至有可能強化日本對朝鮮與中國的箝制，才會對孫文此行講題內容高度警戒。1920年以後，朝鮮獨立運動的主體已由社會主義勢力所領導，主張脫離日本統治而要求完全獨立的聲音成為主流。⁷⁶雖然當時朝鮮內部並不缺乏合法追求殖民地自治權的聲音，例如1921年閔元植一派要求中央參政權，在朝鮮舉行眾議院選舉（但閔本人最後遭暗殺）；也有部分都市資產階級或地主富農等民族改良主義者開始妥協，主張近似殖民地議會的自治運動，並援引愛爾蘭為模範，但這些自治主張，都被朝鮮民眾視為親日而遭唾棄。⁷⁷換言之，當時檯面上主流朝鮮民族運動家所追求的，是

⁷⁴ 錫舟譯，〈日米的將來〉，《臺灣民報》3:3（1925年1月21日），頁7。該文譯自報知新聞社說，文中強調，若要保持對美威信要留意不受美國援助，而不受美國援助的前提是與中國精神與經濟之融合提攜，過去日本受英美指使而凌辱中國，但排日法以來已證明歐美不可信賴，如今若要向白色人種要求對等權利，首先要和中國四億民眾結合，才是解決日美問題的第一步。

⁷⁵ 錫舟，〈確信臺灣議會設置的實現〉，《臺灣民報》3:4（1925年2月1日），頁1。

⁷⁶ 幼方直吉，〈朝鮮參政權問題的歷史的意義〉，《東洋文化》（東京）36（1964年6月），頁11。

⁷⁷ 幼方直吉，〈朝鮮參政權問題的歷史的意義〉，頁6、11。朝鮮民族主義資本創立、立場抗日的《東亞日報》，也曾在同光會解散的報導中，因婉轉且隱諱地提及自治運動而遭到輿論砲轟，1923-1924年間兩度遭民眾發起拒買運動。這些在在顯示當時朝鮮內部民眾強烈的獨立傾向。姜東鎮，《日本の朝鮮支配政策史研究：1920年代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9），頁413-414。另外，主張自治的聲音在1925年以後出現主體變化，朝鮮當局苦於朝鮮人民強烈反抗而改採懷柔政策，由朝鮮總督府帶頭推朝鮮自治論，1927年推出「朝鮮大」的地方議會方案，並於1929年和1931年與中央政府交涉，這些地方議會方案都不脫內地延長主義的範疇。1920年代朝鮮總督府對親日團體的扶植，詳見姜東鎮，《日本の朝鮮支配政策史研究：1920年代を中心として》；臺灣議會與朝

完全獨立；合法與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這與當時臺人在第七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止、左右兩派仍處於「統一戰線」期間，⁷⁸ 共同企求在「合法」的框架下，向日本政府要求自治，並認同日本作為亞洲盟主的政治立場，截然不同。⁷⁹

當然，民報的這種「誤讀」，表面上並未持續太久。同年（1925）3月，戴季陶撰文投稿《改造》，批評日本的東洋政策，這篇文章在4月被民報轉載、翻譯。戴表達：一，廢除山東二十一條；二，拋棄對朝鮮臺灣之殖民統治，允許議會與自治政府，實現民族平等；三，儘速與俄德結盟。戴還道：「前次孫中山先生在神戶鼓吹了東洋的王道文化，或者有人以為這是孫先生因欲投日本人的嗜好，故選了這個題目，但決〔絕〕不如此」，孫此番演講對象不單是朝野官員，更多是為了日本國民，「那是因為今日真的可以負全責任的，非國民全體不可啦」，⁸⁰ 為孫文看似親日的演講內容辯解。民報編輯張我軍轉載後補充道：這篇文章批評

鮮議會運動之比較，詳見韓思素，〈朝鮮與臺灣之自治運動比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

⁷⁸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21。該書將議會運動第一回至第七回，視為「統一戰線時期」。這應該是對照後來左右兩派分裂時期而得到的概念。另外，該書認為第八回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一度取得空前最多的連署，但仔細觀察實際運動內容與成員思想動態，實已進入頹勢。反之，周婉窈則從響應人數認為第八回仍屬高峰，並認為當時文協內部雖有政治結社意見的分歧，但仍一致支持請願運動。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94-96、111。然按照本文第四節所述，若對照1926年文協內部各派人士狀況，筆者認為以統一戰線的分合，來辨別議會運動的發展走勢，較能體現當時情境，故本文將沿用「統一戰線」的概念。

⁷⁹ 小野容照研究朝鮮半島民族運動特徵時，以同樣觀點評論1920年代朝鮮半島與臺灣兩地民族運動的差異，指出兩者雖同為日本帝國殖民地，彼此間聯繫或共同連帶行動卻不活躍，主因在於1920年代前半的臺灣民族運動目的僅在追求自治，而非以狹義的獨立運動為主流，與朝鮮追求完全獨立的目標明顯不同。小野容照，《朝鮮獨立運動と東アジア：1910-1925》（京都：思文閣出版，2013），頁269-270。另外，從當時民報對朝鮮政治形勢的報導也可看出這類差異。1927年1月30日民報142號社說〈臺灣議會與臺灣憲法〉提到朝鮮自治風潮時指出，朝鮮當局過去買收失志鮮人來請願中央參政權達到同化目的，近年則改變方針，操控御用新聞《京城日報》主唱朝鮮自治、要求成立朝鮮議會，藉此緩和獨立派，「可見時勢已大進展，而臺灣民眾也已大有向上，臺灣議會雖未實現，而內外情境已躍進臺灣議會百步以上了。」民報這段記述將朝鮮開始要求自治的聲浪視為「進步的方向」，一方面是為了強調當時臺灣議會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但也同時顯示，民報完全忽視了追求獨立才是朝鮮民眾主流民意之事實。最後，礙於篇幅本文無法詳述，但1920年代朝鮮與臺灣在追求政治自由的道路曲線上，呈現如此反差，應該與兩者歷史地位的變化（各自自由獨立屬國或邊陲要地轉變為日本殖民地）、兩地總督府對各地統治手腕的差異（例如日本礙於間島「不逞鮮人」之反日勢力問題，對朝鮮人民實行更強硬的日本國籍法與朝鮮戶籍法）、兩者主要運動推手背景階級之不同與共產勢力在兩地發展進程的時差（1920年至1921年初，朝鮮半島境內已陸續有金若水、朝鮮共產黨（與1925年成立、受共產國際承認之朝鮮共產黨為不同團體）、社會革命黨等團體，上海境內則有高麗共產黨，1925年4月朝鮮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承認下正式成立）等因素相關。小野容照，《朝鮮獨立運動と東アジア：1910-1925》，頁150-154。

⁸⁰ 戴天仇，〈就日本的東洋政策而言〉，《臺灣民報》3:11（1925年4月11日），頁11-12。

日本東洋政策，「是很難得的好文字故特轉譯在這里〔裡〕，以享讀者」。⁸¹

然而，孫文的大亞洲主義原文講詞，卻要等到1927年初文協左右分裂後，才得以他本人名義，完整重現於民報。這篇同年3月20日民報的〈王道與霸道〉，重新抄錄孫文中文版的部分講詞，主要包括三個重點：孫文對亞洲王道與歐美霸道的解釋、強調日俄結盟、呼籲日本勿做西方霸道鷹之犬。⁸²無巧不巧，這些重錄的內容，神準且恰到好處地彌補了1925年2月1日〈孫先生的亞洲民族聯合演說〉譯稿裡的種種疏漏。這三個論點，明明是孫文該場演講的重要主張，1925年〈孫先生的亞洲民族聯合演說〉卻完全被忽略與漏譯，直到1927年才見天日。這也代表，1927年民報的輿論氛圍與思想底蘊，已與1925年大不相同。從初次轉載翻譯到事後補遺，這兩年時間差，暗喻民報論者已然經歷過某種思想轉型的洗禮。

四、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批評聲浪的出現： 民報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的報導與轉折

1926年8月1日，第一屆亞細亞民族大會在長崎召開。⁸³該會由前文曾提到的「全亞細亞協會」與中國方面的「亞細亞民族大同盟」主辦，大會標榜「亞洲民族的共榮共存」，參加者來自日本、中國、朝鮮、印度、菲律賓、越南等地。一連三天的議程最後決定成立全亞細亞聯盟，並決定設立亞洲通信機關、亞洲會館、亞洲大學、日中問題研究機關等，但中間波折不斷。從事前準備大會起，便因今里準太郎獨斷獨行引起其他理事不滿、岩崎勳因松島遊廓疑獄事件被捕、資金困難而顯得困難重重；又有憲政派議員顧慮該會舉辦造成與歐美關係惡化、會議過程恐怕無法迴避朝鮮臺灣問題而取消參加；等到會議開始後，又有中國代表

⁸¹ 戴天仇，〈就日本的東洋政策而言〉，頁12。

⁸² 〈王道與霸道〉，《臺灣民報》149（1927年3月20日），頁10-11。該文註明是「三月號世界雜誌卷頭言」，筆者查無世界雜誌原件，唯民報內容的譯詞，與1924年12月刊登於《民國日報》之中文版如出一轍。

⁸³ 當時日本警務公安系統密切監視並詳實記錄該會活動過程及相關輿論報導，詳見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紀錄，《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二卷，檔號：I-4-6-0-1_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網站，Ref.: B04013200400- B04013201200。

執意將廢除山東二十一條加入規約，引起日本不滿，政友本黨系三名議員憤而退席；還有朝鮮人士現身會場，與日本主辦方公然辯論朝鮮獨立問題。⁸⁴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期間，民報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報導立場，出現微妙的轉變。1926年1月，亞細亞民族會議預計於8月1日在長崎召開的消息傳開後，民報對該會議如此評價：「亞細亞民族的團結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這個會議是很有意義的。然而對於這個會議我們也有一個提議，是：全亞細亞民族的地位待遇平等。日本民族應有相當的覺悟才是！」⁸⁵此時民報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的召開評價正面，認為有其意義，雖對日本如何看待殖民問題、中國問題抱懷疑慮，但口氣相對溫和。之後3月21日、28日都陸續報導亞細亞民族大會籌辦消息，報導未帶任何評論。

然而，同年5月16日，文協理事會議決議，因尚不明白其目的與主旨，故不參加亞細亞民族大會。⁸⁶此後，民報報導語調出現明顯變化，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立場，一改過去諄諄善誘式的鼓吹與支持，轉為大動作批評。6月6日批評「帝國區區統治黑子彈丸似的臺灣，尚不能得民心，什麼日華親善、什麼東亞聯盟，都是空空的念佛而已」；⁸⁷又報導中國實業代表團數十名前往日本遊歷，一路高唱中日親善，卻被當地中國留學生痛罵，大殺風景，民報論者評論：「殊不知中日親善這句話，本來僅是慣用的口頭禪。」⁸⁸8月初，亞細亞民族大會在長崎畫下句點後，民報嚴詞批評，該會規約標榜以平等和正義為基礎實現恆久的世界和平、確保全人類之自由與幸福云云，都只是常套語，並批評：「盟主是要日本做的，霸權是要日本掌的，而且在日本帝國治下的異民族，是不能引用

⁸⁴ 水野直樹，〈一九二〇年代日本・朝鮮・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收於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綠蔭書房，1996），頁509-548。水野根據前述外務省紀錄《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詳實整理該會活動經緯與當時朝鮮半島與中國本土輿論對該大會的批判。

⁸⁵ 〈全亞細亞民族會議的提議〉，《臺灣民報》90（1926年1月31日），頁9。

⁸⁶ 〈文協理事會議 議決再開夏期學校〉，《臺灣民報》107（1926年5月30日），頁5。

⁸⁷ 〈新刑事訴訟法與臺灣〉，《臺灣民報》108（1926年6月6日），頁2。

⁸⁸ 〈餘錄〉，《臺灣民報》108（1926年6月6日），頁16。然此事件有另一說法，點破日華親善假象的其實是中國實業參觀團中國代表，他們在東京受到日本實業家們歡迎會場上致詞時提道：「……所謂日中親善者，不過是個口頭禪而已，若真欲與中國親善，非先決行取消不平等條約不可」。登山，〈几上談天〉，《臺灣民報》109（1926年6月13日），頁14。

此規約來要求平等自由，又不能講什麼正義幸福。」⁸⁹ 8月15日，民報轉載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的批評，直陳該會只是「騙人之假面具」，認為日本提倡的日華親善，是以大亞細亞門羅主義作號召，目的在於「排歐美勢力於亞洲之外，置亞洲各弱小民族於大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⁹⁰ 在此可以發現，兩年前美國排日法案公布後曾大肆鼓吹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臺人身影，在此已不復見，取而代之是與早年朝鮮半島輿論對日本如出一轍的直白批評——儘管慢了朝鮮足足兩年之久。

真正闡明臺人立場的是9月5日民報一篇〈亞細亞民族大會的矛盾〉。該文鉅細靡遺地抒發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的不滿，開頭點名提倡該會的日本人，只是夢想著「日本人握霸權的亞細亞」，主辦者之一的全亞細亞協會會員都是奉行日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右傾派，既非如左傾派社會主義者一樣提倡亞細亞民族解放，亦非如自由主義者般提倡亞洲各民族自由、國際平等，而是對大會方針皆毫無定見，難怪今春訪問政友會本部曾詢問主辦方立場，理事今里準太郎僅回答：「一切的主義方針，概由大會席上而決定。」⁹¹ 民報論者諷刺，如今回顧會議期間有中國代表提及廢除山東二十一條，另有朝鮮代表討論朝鮮獨立，「假使我們有臨席，自然我們不得不提出臺灣議會急設的要求吧」，此等相對溫和穩健的提案，萬一又被日本代表否決，「民族會議的矛盾，便愈出愈奇了」。⁹²

此處可明顯感受到一種論述上的變化。從一開始對亞細亞民族大會抱持不甚滿意但相對樂觀的態度，後轉為觀望，並指責日華親善淪為空話，直到大會開幕後，可以不留情面地公然批評亞細亞民族大會本身的誤謬。這種論述的變化曲線，可能和以下幾個背景有關。

首先最直觀的，就是受同時期中國國內負面言論的影響。誠如水野直樹分析，中國對該會議動向一開始就有報導，隨著會議舉行在即，開始傳出批評之聲。如《上海商報》（7月27日）指責該會是繼1925年五卅慘案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再次侵略，假中日親善之名來愚弄知識分子、剝削勞動階級，分化中

⁸⁹ 〈餘錄〉，《臺灣民報》117（1926年8月8日），頁16。

⁹⁰ 〈中國國民黨部反對亞細亞民族會議〉，《臺灣民報》118（1926年8月15日），頁6。

⁹¹ 〈亞細亞民族大會的矛盾〉，《臺灣民報》121（1926年9月5日），頁2。

⁹² 〈亞細亞民族大會的矛盾〉，《臺灣民報》121（1926年9月5日），頁2。

國民族團結。後續攻擊則不分左派右派。如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及《廣州民國日報》（8月17日）從反帝的角度，批判此會表面號稱謀求各民族利益，但目的只是假意籠絡各民族、藉此加強日本對亞洲其他民族的奴役。穩健派雜誌《現代評論》（8月14日）則批評日本主張「亞洲門羅主義」作為抗拒歐美、團結東亞的口號，卻始終不放棄帝國主義對他國的侵略，所謂的大亞洲主義僅僅是日本的大亞洲主義，而非實現亞洲各民族正義的大亞洲主義。左派雜誌《嚮導》則在該會舉行前即警告，大亞細亞主義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具」（7月28日），大會結束後則批評日本在會議中，從頭到尾只在乎銀行鐵道等支配全亞經濟命脈的議題，充分顯露帝國主義野心；該組織一旦成功，只會增強中國勞工大眾的剝削，引爆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8月6日）。⁹³

回頭看民報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的批評，其內容皆與上述中國方面輿論類似，故可合理視之為中國輿論同步化的結果。但同時，回想排日法案期間民報論者與朝鮮中國背道而馳、鼓吹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論的身影，亦不免疑惑：為何到此時才開始批評？是什麼讓民報論者動搖、開始毫不掩飾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論的懷疑？又是誰發出了這些批評之聲？

若對照當時臺灣島內政治局勢變化更迭與對岸中國政經情勢的轉換，或許可以覓得線索。1926年3月第七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失利，這次議會運動較特別的是，若槻禮次郎首相原本在質詢時，對臺灣自治與設置議會表達正面肯定，讓人以為形勢大好。⁹⁴ 然沒多久，若槻又解釋，所謂同意自治，是日本內地地方各級機關式自治，並非臺人期望的獨立議會，等於公然否決臺灣議會的可能性。⁹⁵ 甚至在3月11日在貴族院預算委員會上，若槻亦表明：臺灣、朝鮮隸屬帝國領土，允許其設置立法財政獨立機關「是違反憲法的」；臺、朝兩地人民若想參政，派代表到帝國議會較適宜，唯目前時刻尚早，待日後漸進推行。⁹⁶

⁹³ 水野直樹，〈一九二〇年代日本・朝鮮・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頁533-538。

⁹⁴ 若槻發言讓臺人以為請願有望，民報迅速刊載首相答辯抄錄，見〈臺灣統治應採自治主義 首相在衆議院聲明〉，《臺灣民報》93（1926年2月21日），頁7。日文答辯抄錄另刊於《臺灣民報》96（1926年3月14日），頁6。

⁹⁵ 〈首相の答弁を記載してある臺灣民報の禁止 坂東代議士憤慨して再質問〉，《臺灣民報》99（1926年4月4日），頁6-8。

⁹⁶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83-84。

民報對此大表不滿，4月開始批評首相態度一變再變，⁹⁷並重申議會並非追求民族運動或臺獨。⁹⁸這並未澆熄臺人對議會運動的熱情，⁹⁹甚至在下一回的第八回請願運動（1927年1月19日提交眾議院）聚集到2,461名連署¹⁰⁰（另一說林獻堂以下2,470名），¹⁰¹遠高於前幾次。但同時，恰恰也是在第七回請願運動後，「統一戰線」動搖，1926年5-10月，文協內部開始出現政治結社的討論，左右兩派路線分歧漸明。¹⁰²加上竹林事件、二林事件，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所帶來資本主義剝削問題日益嚴重，臺灣社會內部階級分化愈趨白熱化，這些經濟上、階

⁹⁷ 〈善變的首相〉，《臺灣民報》99（1926年4月4日），頁4。

⁹⁸ 〈植民政策和民族觀念〉，《臺灣民報》100（1926年4月11日），頁2。

⁹⁹ 蔡培火在1926年4月5日寄給杜聰明、羅萬偉的書信裡明白寫道：對不採擇的結果甚感遺憾，但仍堅持與同志們攜手繼續努力。參見〈羅萬偉寄予林呈祿之信函〉，《六然居典藏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3_09_0011852，頁29。

¹⁰⁰ 〈臺議請願已提出貴衆兩院 請願人二千四百六十一名的新記錄〉，《臺灣民報》141（1927年1月23日），頁4。

¹⁰¹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25。

¹⁰² 《臺灣日日新報》11月曾報導連溫卿、王敏川、鄭明祿因第七回議會運動若槻首相主張內地延長主義的發言，開始意識到議會運動無望、徒耗金錢光陰，故決定轉換方面，轉向較有可能實現的「地方自治，進而推選代議士，出頭於中央政界」；但貿然中止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難免內部的糾紛」，故今年仍形式上請願，但不代為勸誘連署云云。該則報導不久被連、王、鄭來函抗議，指商議中止臺灣議會請願、轉換路線改進行獲得中央參政權等皆與事實相違，要求取消報導；1926年12月12日《臺灣民報》第135號亦透過社說〈唯有臺灣議會的一路〉（頁1），嚴正聲明臺日報導之要求中央參政權是謠言，「由臺灣的實際上，或由日本國的大計上，唯有跑向臺灣議會這條路而已。」連溫卿日後回憶文協舉行之政治結社討論會：「我以為這次的討論雖然間接與臺灣議會有所關係，但並無直接關係，猶無任何聲明反對」，並指出早於1924年4月在上海創刊的旬刊《平平》，便已闡明臺灣議會運動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助改善臺灣受帝國主義剝削的困境，證明臺灣左派思想的崛起，與第七回議會運動受挫無關。然而，連溫卿所言的「間接」，代表第七回議會請願的失敗，或許不至於讓臺人放棄議會運動，但確實是激起文協內部重新思考政治運動手段的契機。且連、王、鄭三人對臺日報導反應如此之大，筆者認為，與其說是不滿被報導成放棄議會運動（因為這的確與他們日後路線相符），倒不如說是不滿被說成是支持中央參政權，故大動作駁斥。謝春木提到7月底於臺北召開民報總會時，以連、王為首的「臺灣平民黨」案與蔣渭水為首的「臺灣自治會」案相繼提出，兩造討論激烈但最後無果，民族解放思想與無產階級解放思想兩者對立形勢漸成云云，應該是比較貼近當時狀況的說法。〈文化協會幹部が臺灣議會請願中止の申合 今年は形式的な請願はするが 以後は方向を轉換して 一意參政權の獲得へ〉，《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1月19日，第5版；〈文化幹部 議中止臺灣議會請願 再轉換方面 以圖獲得參政權〉，《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1月20日，夕刊第4版；〈文化協會對於 議會請願有二派連王諸氏來函取消〉，《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1月25日，第4版；〈政治結社的討論會〉，《臺灣民報》130（1926年11月7日），頁6；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02-103；謝南光（春木），〈台湾人の要求：民衆党の發展過程を通じて〉，收於謝南光，《台湾人は斯く観る；台湾人の要求；日本主義的没落》（東京：龍溪書舎，1974），頁55。

層上的結構性問題讓左右日漸壁壘分明。

同一時間，對岸中國局勢發展也牽動民報論者對臺灣政治運動的思考。誠如吳叡人指出，1925年3月孫文過世後，國民黨內左右分歧，國共矛盾浮現，隔年3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變，7月北伐。這一連串在中國解放運動在在刺激著臺灣知識分子，激發了他們對臺灣解放路線與「臺灣人」的思考與想像。¹⁰³ 1926年8月22日至1927年2月6日期間，民報上展開著名的陳逢源與許乃昌、蔡孝乾對「中國社會改造論」筆戰，透過中國改造路線的討論，揭開了文協內部民族解放優先、抑或階級解放優先的兩條左右註定對立的路線。之後的發展眾所周知：左派連溫卿、王敏川、鄭明祿等人醞釀文協改組，1927年1月3日成功掌握文協主導權，但同時，鄭明祿、王敏川也被動或自願離開民報，¹⁰⁴ 2月底右派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拿回民報的話語權，積極籌組新組織，經過一連串總督府的駁回，於7月獲准成立臺灣民眾黨，同時持續推動議會運動，於隔年4月25日提出第九回議會設置請願書。

這段期間兩派交鋒下，各路人馬幾欲維持表面和平，避免釀成內鬨、被日方看笑話，但私底下早已相互防備。1月3日會後，蔣渭水對連溫卿憤恨不平，欲脫離文協，卻被林獻堂與蔡培火勸下，因「恐惹人恥笑並生誤解而起內訌，則我文協之前途不可收拾矣，六年間辛苦奮鬥之歷史，具付諸東流，實為可惜」，林認為眼下不如冷靜旁觀，若他們努力為臺奮鬥，屆時再協力亦不遲，但「若彼等用文協以宣傳其共產主義，或是無努力啟發文化，那時欲分裂、欲改革，皆無不可也」。¹⁰⁵ 其他人也抱持同樣意見，認為姑且讓連王一試，日後再圖善後。¹⁰⁶ 而

¹⁰³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頁78。吳叡人另指出，這場論爭的意義不只是對臺灣解放運動路線的思考，而是擴張了作為政治範疇的「臺灣人」或「臺灣民族」意涵，讓「臺灣人」從「以中華民族作為日本國民的臺灣人」的素樸概念，在左翼理論的語言實踐中，被實體化為「世界殖民地弱小民族一支的臺灣民族」。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頁81-82。

¹⁰⁴ 〈餘錄〉，《臺灣民報》146（1927年2月27日），頁16。

¹⁰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1月3日，頁15。

¹⁰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1月7日，頁21。另外也有如林幼春一開始就主張，連王等人欲將文化運動改為勞工運動，吾人非與之脫離，不可為之伍。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1月9日，頁24。

左派也力求表面平衡，在掌握文協後，仍一舉拜訪林獻堂，請求接任委員長一職。

為了避免給外界內鬨的不良觀感，自1926年末種種風聲開始傳出，到隔年鄭明祿、王敏川兩人離開，2月底蔡培火重新接替臺灣支局主任，這期間民報左右兩派共治，雙方文章皆有刊載，並且出現大量關於弭除雙方不合的澄清文，指文協雖然出現路線不同的兩派，但這種分合，是思想進化的必經之路，雙方各有擅場，都是為了謀求臺人幸福；¹⁰⁷ 又或是針對兩派思想進行解說，卻不多加主觀評論；¹⁰⁸ 又或一再強調推動臺灣議會的立場。¹⁰⁹ 這也或許也可解釋，為何第八回請願運動在左右兩派日漸對立的情況下，仍有辦法收集到如此多的連署。

表面雖然和平共存，但私底下，雙方已暗潮洶湧。文協會後，1月9日吳清波造訪林獻堂，提到自己曾當場質問王敏川為何發動修改會則陰謀，卻遭一旁吳石麟丟瓜子羞辱，雙方險大打出手。林獻堂聽到後，讚吳清波竟能忍住不還手。¹¹⁰ 林獻堂對共產主義抱懷高度戒心，19日他在日記裡寫道：「余恐一旦革命後將變成為露西亞，白者為乞丐，赤者為富豪焉。」¹¹¹ 故1月28日連、王等人拜訪林獻堂，請求接任委員長一職時，林堅辭不受。¹¹² 又或雙方為了名簿交接事宜，相拖許久；¹¹³ 還有蔡培火與林獻堂討論將王敏川從民報開除。¹¹⁴ 另外，1926年12月剛入民報、立場偏穩健派的黃旺成，1月3日日記如實記述文協會議上，連溫卿一派無產青年霸佔發話權、不讓他人發言的蠻橫場景，¹¹⁵ 種下他對左派人士的反

¹⁰⁷ 〈過去及現在的臺灣政治運動〉，《臺灣民報》138（1927年1月2日），頁2-4；〈解放運動的進程〉，《臺灣民報》139（1927年1月9日），頁1；〈本報的使命〉，《臺灣民報》141（1927年1月23日），頁1；〈解放運動的派別〉，《臺灣民報》144（1927年2月13日），頁2。

¹⁰⁸ 〈過去一年間的臺灣思想界〉，《臺灣民報》138（1927年1月2日），頁6-7。

¹⁰⁹ 〈政治運動的新努力 宜一掃目下的障害物〉，《臺灣民報》134（1926年12月5日），頁2-3；〈唯有臺灣議會的一路〉，《臺灣民報》135（1926年12月12日），頁1；〈臺灣議會與臺灣憲法〉，《臺灣民報》142（1927年1月30日），頁1。

¹¹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1月9日，頁24。

¹¹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1月19日，頁42。

¹¹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1月28日，頁55。

¹¹³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1月23日、27日、29日，頁48、54-55。

¹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1月20日，頁43。

¹¹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1月3日，頁16。

感，後來幾次巧遇王敏川、鄭明祿的機會，他都藉機逃開。¹¹⁶ 甚至是聽兩人演講後，黃留下「內容形式都是味全嚼蠟，令人討厭」的負面感想。¹¹⁷

右派奪回民報主導權後，左派由王敏川等另起爐灶，籌備機關誌《臺灣大眾時報》。自此，左右兩派對立正式浮出檯面。1927年3月矢內原忠雄來臺，4月10日受舊文協等人邀請演講，但新文協左派人士於旋即於4月16日在臺北舉行「矢內原教授的演講批判演講會」，大肆批評矢內原與舊文協人士，並宣傳無產主義思想。¹¹⁸ 甚至到後來，公然反對舊文協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¹¹⁹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左右兩派逐漸分離，主張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的發言主體也變得明朗、單一。1927年2月，蔣渭水發表〈我的主張〉，一如既往地強調強調民族自決，主張抵禦白人的唯一手段是亞細亞聯盟，其前提是「日本與中華民國須先結盟」，而「這個日華聯盟的前提是須先策劃日華親善。要策劃這個日華親善，須要有媒介者作為橋樑」，而最適合作日華親善的媒介者的，則是「既是中華民族又是日本國民」的臺灣人。¹²⁰ 相對於此，連溫卿一派要求「打破擁護特權階級的制度，以合法的手段，期待實現一般大眾政治經濟社會的解放」，¹²¹ 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云云，早已不在左派人士討論之列。

若依循上述派系分裂與言論變化，回顧1926年期間民報對亞細亞民族大會毫不留情的批評之聲，或許可以推測它們可能都出於社內左派人士之手。當統一戰線逐漸解體，日漸成形的左派陣營重新調整無產階級鬥爭的論述路線，揚棄穩健派強調民族自治、成立議會的種種論點，在這當中，自然也就包含過去一度默認支持的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論述了。當然，我們也無法忽視1924-1926年民報

¹¹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2月21日、24日，頁80、82。

¹¹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2月23日，頁82。

¹¹⁸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132-133。

¹¹⁹ 1928年4月22日第九回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抵達東京前日，王敏川、洪石柱、吳石麟與臺灣青年會社會科學部研究部員黃宗葵等聯手，發表〈關於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我們的態度聲明〉，公然反對議會請願運動，正面批評議會運動成員是「奉迎主義者」、「向支配階級諂媚的背叛者」，因為議會運動解決不了帝國主義對臺灣的經濟剝削。1928年6月3日，王敏川於彰化演講〈大眾運動〉，公然批評「資本主義的民族運動須反對」、「民眾黨的政治運動不是政治鬥爭，卻是政治妥協」。《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93；《臺灣大眾時報》8（1928年6月25日），頁8。

¹²⁰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129。

¹²¹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120。連文發表年代未明，據該書記載為1926-1927年之間。

社內人事更迭，¹²² 導致 1924 年間擁戴亞細亞聯盟論的翻譯與報導，與 1926 年間公然批評亞細亞民族大會的報導，實出自不同人之手，自然立場互異。但可以留意到，幾波人事更迭下，開朝元老之一的王敏川始終屹立不搖。在第二節分析已可發現，王擔任民報記者期間（1923 年 4 月入社，至 1927 年 2 月退社）的 1924-1925 年「統一戰線」時代，他以錫舟為筆名的譯稿與文章，無不熱心強調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之必要、支持成立臺灣議會，但他本人卻在 1926 年之後，徹底轉向左翼論調，最後甚至比連溫卿還「激進」。¹²³ 換言之，王敏川應可當作可靠指標，來解釋民報內部左派人士，面對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論作為一種有效論述，是如何從支持走向揚棄。

另一方面，舊文協派則在孫文信奉者蔣渭水追隨中國國民革命的路線下，開啟右翼臺灣民族解放的論述。這似乎也解釋了前一節最後提到孫文「王道與霸道」的講詞精髓，為何要到 1927 年文協分裂、舊文協派重新控制民報後，才又重新被「正確地」召喚出來。¹²⁴ 但蔣渭水在同年 2 月第一時間雖仍發表〈我的主張〉，高唱日華親善與締結亞細亞聯盟，這套說法卻不見於之後臺灣民眾黨任何實際運動理念之中，反而更像面對日方取締或打壓時的辯解之詞，其中存在多少真心，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作者都存疑。¹²⁵

¹²² 根據莊勝全研究，1924 年 5 月臺灣民報編輯事務由東京轉回臺灣後，主筆為黃呈聰，記者為林呈祿、王敏川、蔣渭水，後陸續加入施至善（1924 年 8 月入社）、張我軍（1925 年 2 月入社，1926 年 6 月前往北京，成為北京駐在通信員）、黃周（1925 年 3 月入社）、陳逢源（1925 年 6 月入社，1927 年 1 月辭職）、謝春木（1925 年 11 月入社）、黃旺成（1926 年 12 月入社）。另一方面，開朝元老的黃呈聰於 1925 年 3 月離職，蔣渭水 1926 年 6 月因開辦文化書局淡出編輯事務。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頁 71-76。

¹²³ 許時嘉，〈《台湾民報》における日本語新聞の転載と翻訳：王敏川の翻訳活動を中心に〉，發表於日本台湾学会主辦，「第 25 回学術大会分科会プログラム」會議論文（名古屋：名古屋市立大学滝子[山の畑]キャンパス 2 号館，2023 年 5 月 28 日）。

¹²⁴ 然礙於史料限制，此推論仍存在疑點。例如蔣渭水自詡孫文信徒，為何能容許 1924-1925 年間民報刊載的孫文講詞出現疏漏。

¹²⁵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 129。另外眾所周知，蔣渭水政治路線也在日後左傾；且與蔣渭水共組民眾黨、社會主義思想濃厚的謝春木也於 1928 年直言：「（日本政府）所謂的日華親善已是賣藥郎的不實口號，（其虛假）與內臺融合不分伯仲」，足見臺人並非不知道作為日本國策口號的日華親善論，現實是如何偽善。相關見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論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對蔣渭水的啟發〉，《臺灣文學研究》（臺南）4（2013 年 6 月），頁 129-165；謝南光（春木），〈台湾人は斯く観る〉，收於謝南光，《台湾人は斯く観る；台湾人の要求；日本主義的没落》，頁 51。

至於那個曾經在 1924-1925 年間、被民報論者熱切信奉，強調日本帶領亞洲人與白種人對抗的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論，不久後又悄悄沒入歷史的縫隙，只能靜靜等待著 1930 年代後重新出現的契機。

五、結論

1924 年美國排日法案公布後，日本、朝鮮、臺灣三地掀起的不同效應。日本興起一股蘊含日華親善意涵的亞細亞聯盟論述與行動；朝鮮半島則強烈反對日本主導的亞細亞聯盟；臺灣方面，則是積極附和日本國內亞細亞聯盟的相關輿論。從《臺灣民報》一連串報導可以看出，論者確信透過亞洲團結、日華親善的論述，可以有效達到議會請願的目的。

這種確信，特別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

其一，去脈絡化與重複且特定的轉載翻譯行為。民報論者翻譯日本國內亞細亞聯盟正反論點時，會選擇性去除文意脈絡，恣意且能動地拼接成自身所需的理論樣貌。例如引述左翼雜誌《改造》中亞細亞聯盟批判特集的文章時，會刪節不適合臺人立場的內容，將文意聚焦在支持亞細亞聯盟成立、日本當懺悔於有色同胞面前的論點上，而忽視原文其實是對國內亞細亞聯盟論的短視提出批評。又或是重複地轉載、翻譯熱切支持亞細亞聯盟的文章，藉此加強輿論聲量。甚至在轉載、翻譯過程中，過度聚焦於強調亞細亞聯盟成立的論點，而忽略原作者（如石崎東國）本身所處的政治光譜。

其二，面對 1924 年孫文大亞洲主義演講內容時，民報論者呈現過度汲取日華親善意涵的「誤讀」狀況。孫文作為反帝象徵，對民報論者而言是理念相近的行動夥伴，他過世後，民報一片追思哀悼，可謂流露對孫文的崇敬與認同。但同時 1924-1925 年當下，他們對孫文大亞洲主義講詞的刻板理解，或漏譯、或超譯，突顯民報論者們當下並非完全明瞭孫文演說內容的背景脈絡。換言之，孫文因時制宜的思想變化與行動背景究竟如何，未必是民報論者時時刻刻所能掌握。

然本文討論以上兩點的目的，絕非想要批評民報論者翻譯有誤，或是指責他們錯誤擷取孫文演講訊息，因為這種評價或爭論並無意義。畢竟，汲取、編輯對

自身有利的觀點來作為行動藉口並號召民意，本就是所有政治運動常見的普遍現象。本文真正的目的，乃透過釐清這些訊息理解上的出入，企圖進一步觀察他們從中得到了哪些「共鳴」——因為這些共鳴點，才是民報論者自身論述慾望的真切投射。¹²⁶ 理解其論述慾望透射的對象，才能有助於我們一窺當時臺灣人推動政治運動過程中，種種論述背後的真實心聲。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民報論者對議會運動毫不懷疑，認為這是臺人合理獲取政治地位的唯一方式，因此，夾雜於日中之間、強調民族自決與臺灣特殊性之際，他們也確信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必須成立，故會主動進行各種訊息的重新編輯。換言之，日華親善論與亞細亞聯盟論，在當時日本國策背景下，對於努力在體制內尋求參政權、但又企圖保有民族差異性的臺人而言，確實是最具說服力、號召力、也最明哲保身的口號路線——因為它證明臺人有別於日本的民族特殊性，卻又不否定臺人作為殖民地人民的現實。

然而，對這種口號路線的「確信」，最終隨著 1926 年以後臺灣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與對岸中國政局變幻而鬆動。第七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文協出現政治結社的種種議論。左右兩派對立浮現，過去共同推動議會運動的「統一戰線」瓦解。強調在體制內進行民族運動的右派人士，仍持續主張日華親善與建立亞細亞聯盟的必要性，但已落於形骸，而左派則轉向階級鬥爭。1926 年期間，民報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的報導，從消極支持轉向積極批判的變化，或許正是隨著統一戰線解體，左派人士對於日華親善與亞細亞聯盟，從曾經的確信、到走向懷疑的最佳寫照。

¹²⁶ 小熊英二指出，1920 年代臺灣從撤廢六三法轉而走向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自治路線，其實是大正民主運動風潮下國際殖民案例被日本殖民政策學者再三誤讀，然後又被臺灣留學生吸收、挪用而導致的美麗誤會。但小熊也指出，指證其中錯誤並無意義，因為「推動現狀的，是存在於人們彼此間的活力，思想只是賦予其形態或方向。在此情況下，思想未必需要『正確』符合原典。就算是曲解或誤讀，只要汲取得到人們一絲潛在慾望，就具備社會機能，當中就存在思想被重置的可能」。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讐運動まで》，頁 340。單純指證譯文錯誤之處的確沒有意義，但本文仍想進一步認識他們挪用或翻譯的過程與脈絡，因為這對重新理解臺人思想建構之過程與邏輯，極其重要。

引用書目

《大阪朝日新聞》

《日本及日本人》

《東亞日報》

《東京朝日新聞》

《臺灣》

《臺灣大眾時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報》

〈羅萬俾寄予林呈祿之信函〉，《六然居典藏史料》，識別號：LJK_03_09_001185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 第一卷 分割1〉（1925年7月25日），《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 第一卷》（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I-4-6-0-1_1_001，頁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網站，Ref.: B04013200400，下載日期：2023年8月15日，網址：<https://www.jacar.go.jp/>。

《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 第一卷》，檔號：I-4-6-0-1_1_00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網站，Ref.: B04013200300~B04013200700，下載日期：2023年8月15日，網址：<https://www.jacar.go.jp/>。

《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 第二卷》，檔號：I-4-6-0-1_1_00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網站，Ref.: B04013200800~B04013201200，下載日期：2023年8月15日，網址：<https://www.jacar.go.jp/>。

アールビーボース

1924 〈東洋人聯盟の目標〉，《臺灣民報》2(11): 9。

1924 〈東洋人聯盟の目標〉，《改造》6(6): 83-85。

コリア研究所（編訳）

1990 《消された言論：日本統治下の「東亞日報」・「朝鮮日報」押収記事集 政治篇》。東京：未來社。

一 舟

1924 〈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臺灣民報》2(9): 1。

千葉氏

1924 〈日本對同色民族要悔悟了〉，《臺灣民報》2(11): 9-10。

千葉龜雄

1924 〈血は水よりも濃い〉，《改造》6(6): 86-87。

小野容照

2013 《朝鮮獨立運動と東アジア：1910-1925》。京都：思文閣出版。

小熊英二

- 1998 《「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

中島岳志

- 2005 《中村屋のボース：インド独立運動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東京：白水社。

水野直樹

- 1996 〈一九二〇年代日本・朝鮮・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收於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頁 509-548。東京：綠蔭書房。

加藤陽子

- 2002 《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東大式レッスン！征韓論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東京：講談社。

外務省（編）

- 1981 《日本外交文書 大正期 大正十三年第二冊》。東京：外務省。

平林初之輔

- 1924 〈不可能な幻想〉，《改造》6(6): 85。

幼方直吉

- 1964 〈朝鮮参政権問題の歴史的意義〉，《東洋文化》（東京）36: 1-20。

石崎東國

- 1912 〈予の王学に入りし径路〉，收於石崎東國，《陽明学派の人物》，頁 168-176。大阪：前川書店。

- 1924 〈人種問題と亜細亞文化聯盟〉，《日本及日本人》48: 70-75。

- 1924 〈大鹽平八郎 太平天国の建設者大鹽格之助〉，收於國史講習會編，《國史上疑問の人物：忠臣か逆臣か實在か傳説か》，頁 84-108。東京：雄山閣。

- 1926 〈南洲先生を今に在らしめば〉，《日本及日本人》89: 52-56。

石崎東國（著）、錫舟（譯）

- 1924 〈人種問題と亞細亞文化聯盟〉，《臺灣民報》2(11): 6-8。

吉田公平

- 2011 〈石崎東國と大阪陽明学会の創設の頃：大阪における大鹽平八郎〉，收於大塩事件研究会編，《大塩平八郎の総合研究》，頁 293-315。大阪：和泉書院。

安井三吉

- 1989 〈講演「大亜細亞問題」の成立とその構造〉，收於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頁 1-38。京都：法律文化社。

- 1991 〈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の研究を深めるために：高綱博文氏の批判に寄せて〉，《歴史評論》（東京）498: 77-90。

安部磯雄

- 1924 〈東洋人連盟必要なし〉，《改造》6(6): 81-82。

江燦騰

- 2001 《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何義麟

- 2013 〈大亜細亞協會の活動と植民地知識人の対応：台湾における日華親善論の変容〉，收於松浦正孝編著，《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頁 447-475。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吳叡人

- 2001 〈「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 43-110。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周婉窈

- 1989 《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 2004 《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前 非

- 1924 〈黃色人種應該着覺悟嘍！〉，《臺灣民報》2(24): 5-6。

姜東鎮

- 1979 《日本の朝鮮支配政策史研究：1920年代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秋田雨雀

- 1924 〈聯盟に就ての二つの母体〉，《改造》6(6): 85。

若林正丈

- 2001 《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 増補版》。東京：研文出版。

若槻泰雄

- 1972 《排日の歴史：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日本人移民》。東京：中央公論社。

宮澤誠一

- 2008 〈「起源神話」としての明治維新：大逆事件の衝撃と波紋〉，《教養研究》（北九州）15(2): 5-27。

桑 兵

- 2006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の大亞洲主義演説〉，《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廣州）46(6): 1-13。

高綱博文

- 1991 〈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講演をめぐる：《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を中心に〉，《歴史評論》（東京）494: 65-80。

莊勝全

- 2017 〈《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許時嘉

- 2023 〈《台湾民報》における日本語新聞の転載と翻訳：王敏川の翻訳活動を中心に〉，發表於日本台湾学会主辦，「第 25 回学術大会分科会プログラム」會議論文。名古屋：名古屋市立大学滝子[山の畑]キャンパス 2 号館，5 月 28 日。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

1988 《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

陳逢源

1922 〈輓近世界の潮流を洞察せよ〉，《臺灣》3(3): 19-23。

1923 〈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臺灣》4(1): 18-33。

陳翠蓮

2013 〈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6: 53-99。

陳德仁、安井三吉（編）

1989 《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京都：法律文化社。

登山

1926 〈几上談天〉，《臺灣民報》109: 1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2013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5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昌毅

1989 〈孫先生「大亞洲主義」演說詞〉，《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12月8日，收於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頁55-65。京都：法律文化社。

嵯峨隆

2016 《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林書揚等（編輯）、王乃信等（翻譯）

2006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 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年）：第二冊 政治運動》。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趙勳達

2011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國家發展研究》（臺北）10(2): 77-116。

2013 〈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論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對蔣渭水的啟發〉，《臺灣文學研究》（臺南）4: 129-165。

劍

1924 〈對護憲內閣的希望：要更新殖民地統治方針〉，《臺灣民報》2(11): 1。

劍如

1925 〈朝野何其無人呢？〉，《臺灣民報》3(1): 4。

1925 〈人種偏見的挑發〉，《臺灣民報》3(2): 8。

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井清研究会（編）

1996 《排日移民法と日本のマスメディア》。東京：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井清研究会。

2012 《排日移民法と日本のマスメディア・続》。東京：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玉井清研究会。

蔣渭水

1924 〈駐華美公使之愚論〉，《臺灣民報》2(10): 4。

1925 〈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 43-45。

箕原俊洋

2016 《アメリカの排日運動と日米関係：「排日移民法」はなぜ成立したか》。東京：朝日新聞出版。

錫舟

1924 〈由酣睡中大亞細亞的覺醒和白人侵掠的抗拒；「白人米國」的建設和排日案〉，《臺灣民報》2(12): 5-6。

1925 〈確信臺灣議會設置的實現〉，《臺灣民報》3(4): 1。

錫舟（譯）

1925 〈亞細亞民族的團結 日華提攜的必要〉，《臺灣民報》3(1): 15-16。

1925 〈對孫文的希望 迎其在神戶寄港〉，《臺灣民報》3(1): 17-18。

1925 〈治外法權的撤廢 中國國民的要求〉，《臺灣民報》3(2): 9-10。

1925 〈日米的將來〉，《臺灣民報》3(3): 7。

戴天仇

1925 〈就日本的東洋政策而言〉，《臺灣民報》3(11): 10-12。

謝南光

1974 《台湾人は斯く観る；台湾人の要求；日本主義的没落》。東京：龍溪書舎。

韓恩素

2012 〈朝鮮與臺灣之自治運動比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魏琴

1924 〈國民會議，軍閥和帝國主義〉，《嚮導週報》97: 809-810。

羅詩雲

2013 〈臺灣近代知識建構的可能：論 1920 年代《臺灣青年》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臺灣學研究》（新北）16: 151-179。

藤井昇三

1966 《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勁草書房。

Grover, Verinder (ed.)

1993 *Political Thinkers of Modern India Vol. 22 Chittaranjan Das*. New Delhi: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Reports Comments, and Change in Discourse on Sino-Japanese Amity and Union of Asia in *Taiwan Minpao* (1924-1926)

Shih-chia Hsu

ABSTRACT

Between 1924 and 1926, *Taiwan Minpao*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Sino-Japanese Amity (Nikka Shinzen) and the Union of Asia (Ajia Renmei). Analyzing these articles reveals the change of Taiwanese political activists from initial belief in Sino-Japanese Amity that would support the petition driv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ese Parliament to disillusionment and distrust.

The USA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which prevented immigration from Japan, resulted in a vigorous rise of the Union of Asia doctrine, along with the idea of Sino-Japanese Amity; both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a political party in Japan. While Korean national activists unequivocally opposed Japan's leadership in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Union of Asia, their Taiwanese counterparts—or at least some of them—showed enthusiastic responses by actively translating relevant articles for *Minpao* and praising the doctrines as promising. Such enthusiasm was due to their conviction that the Union of Asia would necessarily include meaningful advancement of Sino-Japanese Amity, which would in turn dr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ese parliament.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in *Minpao*,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ir conviction was formed and expressed. The analysis also uncovers cases of contextomy (quoting out of context) in the translated articles as well as those of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most notably of Sun Yat-sen's speech on Pan-Asianism in Kobe.

However, the failure of the 7th petition driv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ese parliament in March 1926 and the launch of Northern Expedition in China worsene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right and the left. The political 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shook the activities' conviction in Sino-Japanese Amity. While the right-wing nationalists still insisted on the need for Sino-Japanese Am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on of Asia,

the left-wing activists began focusing on the social class conflicts in Taiwa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wo parties for the petition drive crumbled. The need for Sino-Japanese Am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on of Asia were no longer on the left-wing's agenda.

Keywords: Sino-Japanese Amity (Nikka Shinzen), Union of Asia (Ajia Renmei), USA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Translation Issues in *Taiwan Minpao*, Sun Yat-sen's Speech on Pan-Asianism in Kobe